



# 中等收入陷阱

---

概述



# 中等收入陷阱

---

概述

本出版物包含了《2024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等收入陷阱》(doi: 10.1596/978-1-4648-2078-6)的概述、目录、前言等内容。最终报告的PDF电子版将在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 和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 提供, 纸质报告可通过 [www.amazon.com](http://www.amazon.com) 订购。引用、复制、改编本报告请使用报告的最终版本。

© 2024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  
1818 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433  
电话: 202-473-1000; 网址: [www.worldbank.org](http://www.worldbank.org)

#### 保留部分权利

本作品是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成果, 其中也包括外部人士的贡献。本作品中所述之发现、解释和结论并不一定反映世界银行、其执行董事会或各执行董事所代表之政府的观点。

世界银行不保证本报告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或实时性, 不对内容中的任何错误、遗漏或差异负责, 也不对使用或未使用某种信息、方法、过程或结论承担责任。本作品中的边界、颜色、名称、链接/脚注和其他信息, 并不意味着世界银行就任何领土的法律地位作出任何判断, 也不表示认同或接受这些边界。引用他人作品并不意味着世界银行认同这些作者表达的观点或其作品的内容。

此处任何条款都不构成也不应被视为世界银行对任何特权或豁免权的限制或放弃; 世界银行明确保留所有这些权利。

#### 权利与许可



本作品根据知识共享署名3.0政府间组织许可协议 (CC BY 3.0 IGO)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3.0/igo> 进行许可。根据知识共享署名许可协议, 您可以在以下条件下自由复制、分发、传播、改编此作品, 包括用于商业目的:

**标明出处**—请按如下方式引用本作品内容: 世界银行。2024。《2024年世界发展报告: 中等收入陷阱》概述。世界银行, 华盛顿特区。许可: 知识共享署名许可协议 CC BY 3.0 IGO

**翻译**—若要翻译本作品, 请在标明出处的同时加上下列免责声明: 本翻译不是世界银行的作品, 不应被视为世界银行的正式译本。世界银行对译文中的任何内容或错误概不负责。

**改编**—若要改编本作品, 请在标明出处的同时加上下列免责声明: 这是对世界银行原创作品的改编。本改编作品中的观点和看法完全是改编者的责任, 世界银行对改编内容未作认可。

**第三方内容**—世界银行未必拥有本作品全部内容的所有权。因此, 世界银行不保证使用本作品中第三方所有的内容不会侵犯第三方权利, 由此引起的索赔风险完全由使用者承担。如您希望使用本报告部分内容, 您有责任确定是否需要获得许可, 在需要许可的情况下从版权所有那里获得许可。此类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图表和图片。

所有关于版权和许可的询问, 请联系世界银行出版部。地址: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The World Bank, 1818 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433, USA; 电子邮件: [pubrights@worldbank.org](mailto:pubrights@worldbank.org)。

**封面及内页设计:** 世界银行全球机构解决方案局创意服务组。

# 目录

v 前言  
vii 致谢

<b>1</b>	<b>概述：创造奇迹</b>
1	要点
2	“致富光荣”
3	一个陷阱还是两个？
5	投资、引进和创新——递增渐进
9	创造性破坏经济学
14	保持适当的平衡
22	未来之路
23	注释
24	参考文献

## **27 《2024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等收入陷阱》目录**

### **专栏**

<b>11</b>	<b>O.1 谁是在位者？什么是在位者？ 领先的企业、技术、国家、精英——还有男性</b>
-----------	---

### **图**

<b>3</b>	<b>O.1 中等收入国家相对于美国的人均收入几十年来一直停滞不前</b>	<b>5</b>	<b>O.3 随着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转型，经济复杂程度越来越高</b>
<b>4</b>	<b>O.2 如果仅有资本积累就可以，中等收入国家的工作回报率将是美国的近四分之三，而不是仅五分之一</b>	<b>6</b>	<b>O.4 中等收入国家晋升高收入国家必须经历连续两次转型</b>
		<b>7</b>	<b>O.5 韩国、波兰和智利在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快速增长中经历了数次经济危机</b>
		<b>8</b>	<b>O.6 韩国：从引进到创新</b>

<b>9</b>	<b>O.7</b>	过去40年里, 韩国相对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持续攀升, 而巴西的劳动生产率则在达到峰值后下滑	<b>17</b>	<b>O.11</b>	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很少有企业获得风险资本或私募股权投资
<b>10</b>	<b>O.8</b>	关于创造性破坏的三种观点	<b>20</b>	<b>O.12</b>	拥有大量成功侨民的国家最有可能实现知识转移
<b>12</b>	<b>O.9</b>	中等收入国家资源分配极其不当, 创造力量不足	<b>22</b>	<b>O.13</b>	中低收入国家可再生能源的资本成本很高
<b>15</b>	<b>O.10</b>	中等收入国家必须在创造、守成和破坏之间保持平衡			

## 表

<b>4</b>	<b>O.1</b>	2022年世界银行国家类别和部分全球指标	<b>23</b>	<b>O.3</b>	3i战略: 各国在不同发展阶段应采取的行动
<b>6</b>	<b>O.2</b>	要跨入高收入行列, 各国需要重新调整投资、引进和创新政策组合			

# 前言

2007年，世界银行在题为《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的研究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术语。当时正处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减贫势头尤为迅猛的十年。然而，那时已经很明显，许多经济体，特别是拉美和中东地区经济体，尽管致力于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数十年来一直停滞不前。“中等收入陷阱”现在是一个流行的术语：用谷歌搜索一下，会跳出数以万计的词条引用。它经常被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和政治家们挂在嘴边，从拉丁美洲到南亚，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是如此。

十年前，在“中等收入陷阱十岁了”一文中，我和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学家霍米·卡拉斯检视了源起于《东亚复兴》的众多文献。我们发现，经济学家尚未提出可靠的增长理论，来帮助政策制定者引导驾驭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国家的成功转型。一些经济学家试图建立各种模型，但这些模型并不足以代替一个结构周密的、决策者可以在其基础上制定有效发展战略的增长框架。与此同时，中等收入国家的队伍继续壮大。五年后，我们在《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增长战略》一文中提出，强调创造性破坏和制度变革的熊彼特增长模型有可能为更全面地理解中等收入经济体提供研究基础。但是，要使之发挥作用，就必须使之更容易为政策制定者所理解。

这就是《2024年世界发展报告》的目标：提供一个简单而可靠的避开或摆脱陷阱的增长框架。报告总结了发展中国家50多年来攀登收入阶梯的成败得失。基于这些理念和证据，报告为当今100多个中等收入国家建议了一套先后有序、三管齐下的方法：首先是“投资”，其次从世界各地“引进”新技术，最后是“创新”。每一阶段都需要采用新的政策组合，如果实施得当，会产生更有活力的企业，更高生产率的劳动力队伍，以及更加节能的经济。这套方法可以惠及所有寻求高质量增长的国家，不论是低收入、中等收入国家，还是高收入国家。

我们并不天真到以为这会轻而易举。中等收入国家将不得不创造奇迹：不仅要将在本国提升到高收入水平，而且还要摆脱会导致环境破坏的碳密集型增长道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收入水平与十年前相同，其一半以上人口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一直在下降，预计2020年代的平均增长率仅为4%，低于2010年代的5%和2000年代的6%以上。

这点关系到全世界。全球四分之三的人口、近三分之二的极端贫困人口居住在中等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占世界经济总产出的40%，占全球碳排放量的近三分之二。简而言之，全球消除极端贫困、增进繁荣和宜居性的努力成功与否，基本上将由这些国家决定。

未来的道路面临着比过去更加严峻的挑战：人口迅速老龄化和债务水平激增、激烈的地缘政治和贸易摩擦，以及在不污染环境的情况下加快经济发展的难度日益增大。然而，许多中等收入国家仍在沿用上个世纪的策略，主要依靠旨在扩大投资的政策。这就好比汽车只挂一档，却想让它开得更快。如果继续固守过时的策略，在到本世纪中叶创造较为繁荣社会的竞赛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将是输家。按照目前的趋势，要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四分之一，中国还需要10多年，印度尼西亚需要将近70年，印度则需要75年。

撰写这份报告的团队期望这一运算大幅改观。我们希望《2024年世界发展报告》能在不久的将来，使“中等收入陷阱”这一说法彻底过时。

英德米特·吉尔  
世界银行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兼发展经济学高级副行长

# 致谢

《2024年世界发展报告》由Somik V. Lall领导的世界银行团队编写。Ufuk Akcigit担任学术负责人，Joyce Antone Ibrahim担任报告负责人。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英德米特·吉尔提供了总体指导。报告编写工作由发展经济学副行长直辖部门主持。

核心团队人员包括 Roberto Fattal Jaef, Maria Marta Ferreyra, Kenan Karakülah, Tatjana Kleineberg, Mathilde Lebrand, Martha Martinez Licetti, Dino Merotto, Forhad Shilpi, Katherine Stapleton, Maria Vagliasindi, Ekaterina Vostroknutova。

研究分析师包括Victor Ajayi, Deniz Aycan, Narcisse Cha'ngom, Dong Phuong Dao, Matteo Gasparini, Juan Holguín Posada, Karry Jiao, Yonatan Litwin, Theodore Naff, Juan Porras Lopez, Mariana Santi, Zeki Berkay Saygin, Karthik Sridhar, Gabriel Suárez Obando, Adesola Sunmoni, Facundo Ulivarri, Natalia Valdebenito Contreras。

Selome Missael Paulos (2023年5月之前) 和Sandi Soe Lwin (2023年5月开始) 为报告团队提供了行政支持。

以下各位在不同阶段为报告提供了建议: Pia Andres, Oya Pinar Ardic Alper, Sina Ates, Christopher Bataille, Tania Begazo Gomez, Bhavna Bhatia, Tanuj Bhojwani, Julia Bird, Craig Chikis, Xavier Cirera, Fernando Dancausa Diaz, Yuheng Ding, Maciej Drozd, Alice Evans, Nisan Gorgulu, Soulange Gramegna Mesa, Rogelio Granguillhome Ochoa, Michael Grubb, Federico Haslop, Sheirin Iravantchi, Gautam Jain, Aidara Janulaityte, Noah Kaufman, Joohyun Lee, Munseob Lee Ming Lu, Antonio Martins Neto, Penelope Mealy, Nandan Nilekani, Stefanie Onder, Paul Phumpiu Chang, Denisse Pierola Castro, Brian Pinto, Laurent Porte, Gaël Raballand, Ana Belen Ruival, Sagatom Saha, Yongseok Shin, Hassan Soumya, Sowjanya, Yana R. Ukhaneva, Harald Walkate, Diane Zovighian, María Pluvia Zúñiga Lara。

Nicolas Moschovakis, Bruce Ross-Larson和Timothy Taylor 指导了报告的编写过程。Anthony Venables是扩展团队成员。

Anwar Aridi和Hoon Sahib Soh为关于韩国的专栏1.2供稿。Karsten Staehr 和 Sebastian Stolorz 撰写了关于保加利亚、爱沙尼亚和波兰的专栏2.2。Tristan Reed 和Kersten Stamm撰写了关于加速投资的专栏2.3。Pinelopi Goldberg, Michael

Peters 和 Aishwarya Ratan 撰写专栏5.3, 讨论了增长的性别障碍。Oscar Calvo-González撰写了专栏8.4西班牙的增长奇迹。Marek Hanusch撰写了关于巴西的专栏8.5。

Nurana Ahmadova, Narcisse Cha'ngom, Karry Jiao, Gabriel Suárez Obando, Renato Schwambach Vieira协助审校了译文。

牵头负责沟通宣传策略的团队成员有Chisako Fukuda、Kristen Milhollin, Karolina Ordon, Joseph Rebello, Mikael (Kelly) Reventar, Shane Romig, Mariana Teixeira。Roula Yazigi提供了网页和线上服务。

在此要特别感谢Mark McClure协调监督本报告的正式制作, 以及世界银行正式出版计划的Cindy Fisher和Patricia Katayama。Mary C. Fisk组织概述和核心信息的多语种翻译, 翻译团队在Bouchra Belfqih协调下完成翻译工作。Yaneisy Martinez和Orlando Mota负责报告及众多附属产品的印刷和电子格式转换。

报告由Sabra Ledent和Nancy Morrison编辑, Gwenda Larsen和Catherine Farley负责校对。Robert Zimmermann核对了报告中的大量引文, 协助了编辑工作。封面和内页版面由世界银行全球机构解决方案局的设计团队设计。Critical Stages的Bill Praguski设计了报告中的部分图和信息图表。Datapage提供排版服务。

Dayana Leguizamon为报告团队提供了资源管理支持。报告团队还要感谢世行各国代表处的同事, 他们提供了后勤支持, 并协助开展利益攸关方参与工作。团队要特别感谢Marcelo Buitron、Gabriela Calderon Motta、Grace Soko在协调工作以及高层接触策略方面的支持。

报告团队也对世行集团其他同事提供的指导、评论和建议深表谢意, 尤其是以下部门的同事: 发展经济学副行长直辖部门;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东非与南非地区; 经济和私营部门发展副总裁直辖部门(国际金融公司); 教育全球实践局; 环境、自然资源和蓝色经济全球实践局; 公平增长、金融与制度副行长直辖部门; 欧洲与中亚地区; 机构对外关系部; 性别部; 人类发展副行长直辖部门; 独立评价局; 基础设施副行长直辖部门; 拉美与加勒比地区; 中东和北非地区; 贫困与公平全球实践局; 南亚地区; 可持续发展副行长直辖部门; 以及西非与中非地区。团队还要感谢在报告的全行正式评审过程中提出书面意见的诸多同事, 这些意见在报告编写的关键阶段为我们提供了宝贵指导。

报告团队感谢高级别顾问小组以下成员提供的建议和指导: 全球发展中心主席Masood Ahmed; (南非)发展和企业中心执行主任Ann Bernstein; 印度国家应用经济研究委员会总干事、印度总理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Poonam Gupta; 布鲁金斯学会可持续发展中心全球经济与发展高级研究员霍米·卡拉斯; 智利财政部长马里奥·马塞尔; 突尼斯前经济发展部长兼规划和区域发展部长、前中央银行行长穆斯塔法·卡迈勒·纳卜利; 肯尼亚财政部长恩朱古纳·尼敦古; 哥伦比亚前财政部长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 欧盟委员会地区与城市政策总司代总司长Normunds Popen (至2024年1月); 约旦前教育部长、前首相奥马尔·拉扎兹。

报告团队收到了学术顾问委员会以下成员的建议和意见: Daron Acemoglu (麻省理工学院)、Philippe Aghion (法兰西学院、欧洲工商管理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Gerardo Esquivel (墨西哥大学)、Ricardo Hausmann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Robert Pindyck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Danny Quah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Jahen F. Rezki (印度尼西亚大学)、徐其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Fabrizio Zilibotti (耶鲁大学)。报告团队还咨询了学术界以下人士的意见: Manuel Agosin (智利大学)、Belinda Archibong (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Iwan Azis (康奈尔大学、印度尼西亚大学)、Nicolas Bottan (康奈尔大学)、Andrea Bubula (哥伦比亚大学)、John Carruthers (康奈尔大学)、Julieta Caunedo (康奈尔大学)、Nancy Chau (康奈尔大学)、Abigayle Davidson (阿斯彭研究所)、JanEeckhout (庞培法布拉大学)、GaryFields (康奈尔大学)、Caroline Flammer (哥伦比亚大学)、Rodrigo Fuentes (智利天主教大学)、Alvaro Garcia-Marin (洛杉矶第斯大学)、Ravi Kanbur (康奈尔大学)、David Kohn (智利中央银行、智利天主教大学)、Saurabh Lall (格拉斯哥大学)、Patricia Mosser (哥伦比亚大学)、Cristian Pop-Eleches (哥伦比亚大学)、Jan Svejnar (哥伦比亚大学)、Eric Verhoogen (哥伦比亚大学)。

我们还要感谢以下学者参加《2024年世界发展报告》团队主办的一系列研讨会并发言: Craig Chikis (芝加哥大学)、Sebastián Gallegos (智利圣地亚哥阿道夫-伊瓦涅斯大学商学院)、Pulak Ghosh (印度管理学院, 班加罗尔)、Munseob Lee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Ming Li (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Javier Miranda (德国哈勒经济研究所)、Ricardo Paredes (Duoc大学前校长、自由贸易特别法庭现任部长, 智利圣地亚哥)、Marta Prato (博科尼大学, 米兰)、Younghun Shim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María Pluvia Zúñiga Lara (联合国大学马斯特里赫特经济与社会创新技术研究所, 荷兰马斯特里赫特)。

报告团队感谢组织主办学术界圆桌讨论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美国)、复旦大学(中国)、国家应用经济研究委员会(印度)、Políticas Públicas (哥伦比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中国)。

报告团队与多国政府开展了一系列双边磋商, 并进行了实地考察, 包括巴西、智利、中国、哥伦比亚、欧盟委员会、印度、意大利、肯尼亚、墨西哥、摩洛哥和英国。

报告团队受益于多家智库、研究机构、学术机构、公民社会组织、私营部门组织和其他组织的意见, 包括埃森哲、非洲经济转型中心、非洲经济研究联合会、蚂蚁集团、智利信贷与投资银行、Betterfly、波士顿咨询公司、Celulosa Arauco y Constitución、高级经济研究中心、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社会与经济进步中心、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中国社会科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埃劳迪经济与金融研究所、Empresas Copec、Enel、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复旦大学、智利基金会、海通国际证券集团有限公司、哈佛大学增长实验室、华泰证券、Inria、上海世界经济研究所、上海大学比较政治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智利天主教大学经济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统计与应用经济研究所、中国发展研究中心、Inversiones SB、拉尔·巴哈杜尔·沙斯特里国家行政学

院、国家应用经济学研究委员会、国家评估与生产力委员会、NTT Data智利、泛美学生贷款机构协会、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天空航空、Sonda S.A.、松禾创智成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腾讯研究院、托马斯·B·福特汉姆研究所、清华大学、瑞银财富管理、联合国（摩洛哥）、Andrés Bello大学、智利大学经济与商业学院、安第斯大学、智利发展大学和VIDA Security。

报告团队希望对以上名单中不慎遗漏的个人或机构表示歉意，向所有为本报告做出贡献者表示感谢，包括那些姓名未出现在此的人员。团队成员还要感谢家人在本报告编写过程中给予的支持。

# 概述： 创造奇迹



## 要点

中等收入国家正在与时间赛跑。从1990年代到现在，很多国家在跨越低收入水平和消除极端贫困方面做得足够出色，使得大家普遍认为过去三十年是全球发展的伟大时代。但这是因为期望值极低，毕竟30年之前，世界三分之二以上人口每天的生活费还不到一美元。目前人均收入在1136美元至13845美元之间的中等收入国家有108个，这些国家有志于在未来二三十年达到高收入水平。按照这一目标来衡量，过去的记录是惨淡的：自1990年以来只有34个中等收入经济体转型达到高收入水平，其总人口不到2.5亿，相当于巴基斯坦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前景进一步恶化。随着国内债务增加和人口老龄化、发达经济体保护主义日益加剧以及加快能源转型的压力不断增加，如今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发展空间越来越狭窄。当前中等收入国家的60亿人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看到本国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的希望从来都不大，而现在这一希望无疑更加渺茫。

《2024年世界发展报告》汲取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发展经验，并结合了熊彼特学派经济学家在经济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指明了前进路径，以避免陷入为人熟知令人生畏的“中等收入陷阱”。报告指出，中等收入国家需要的不是一次而是两次转型。第一次是从加快投资的1i战略转型到投资和引进并重的2i战略，在2i战略下，一个国家从国外引进技术并在本国推广。中等偏低收入国家的政府必须采取与投资驱动型战略配套的措施，将世界各地的现代技术和成功商业流程引进到

本国经济之中。这就需要将大量的国内产业打造为全球的商品和服务供应商。

一旦一个国家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就可以转向更加重视创新的3i战略。引进成功的中等偏高收入国家可在投资和引进基础上，辅之以创新——开始不再只是借鉴全球技术前沿的思想理念，而是推动前沿技术的发展。这一阶段需要再次调整企业、工作和能源使用，并更加重视经济自由、社会流动和政治竞争。

增长战略的转变不会自动发生。是否成功将取决于社会能否平衡好创造、守成和破坏的力量。社会可以通过约束在位者、奖励有益举措、善用危机来做好平衡。在位者——大公司、国有企业和有权势的公民——可以产生巨大价值，但同样可以轻易地减损价值。各国政府必须制定相关机制，通过鼓励新加入者的竞争制度来约束在位者，同时既不溺爱中小型企业，也不抹黑大公司。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等收入国家的技术人才储备较少，利用效率也较低，因此必须完善人才储备和分配机制。廉价可靠的能源一直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石，但现在追求繁荣的同时要保持地球的宜居性，因此就更需要重视节能和降低排放强度。民粹主义兴起、气候变化等紧急事态也为摒弃过时安排、采取崭新做法提供了机会；危机令人痛苦，但在民主国家，危机有助于为艰难的政策改革形成所需的共识。

为数不多的从中等收入迅速跨越至高收入水平的经济体，通过约束有权势的在位者鼓励企业发展，通过奖励有益举措培养人才，并通过善加利用危机改革了不再符合其初衷的政策和体制。今天的中等收入国家也必须这样做。

问题是怎么做。这些中等收入经济体要实现繁荣面临的问题错综复杂，但解决之道却出奇地简单直接：必须提高资本、劳动力和能源的使用效率。虽说言易行难，但过去三十年的经济研究成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指引。

读者可能会立即意识到，将一个国家的发展与其人均收入等同起来是有问题的。事实上，发展研究从业者一直在使用一系列类似的表面性指标来评估经济及其子系统如产业、社会和生态的结构强度。我们已经习惯于使用行业内企业规模分布来衡量生产效率，使用家庭收入分布来评估社会稳定性，使用能源来源分布来估测生态可持续性。但是，随着经济结构日趋复杂，这些衡量指标变得越来越不准确，对制定政策的指导作用也越来越差。

《2024年世界发展报告》基于这样的推测，即相对于其经济结构的复杂性，中等收入国家的信息赤字问题比低收入国家或发达经济体更严重。因此基于表面性经济效率指标的政策对他们的影响尤为严重，使他们尤其容易过早地放缓发展。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将这种不正常现象称为“中等收入陷阱”，而避免这一陷阱的战略正是本《报告》的主题。

在实施这些战略时，《报告》建议不要使用企业规模、收入不平等、能源来源等相对表面的指标来制定政策，而应依赖于增加值、社会经济流动性、排放强度等绝对可靠的衡量指标。对于制定政策而言，这些指标更切合实际，但要求也更高。政策制定者必须更愿意公开敏感数据，更愿意公开讨论政策，并抓住一切机会废除过时的安排。这么做虽然需要较难获得的信息，但势在必行。因为不这么做，中等收入国家将如同盲人航行于日益汹涌的大海之中。

自1970年代以来，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中位数一直低于美国的十分之一。日趋复杂的地缘政治、人口和环境问题将使未来的经济增长更加困难。要想逆风而起成为发达经济体，中等收入国家必须创造奇迹。

## “致富光荣”

你是全世界108个中等收入国家之一的政策制定者。你已经认识到，打造一个稳固可靠的宏观经济基础对于吸引国内外私人投资至关重要，而这一基础需要有强劲的体制机构和廉洁的治理来支撑。而且如同近半个世纪前邓小平提出“致富光荣”，你心中同样也有宏伟蓝图。

如果你是中国人，贵国“十四五”规划提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同时大幅扩大中产人群比例。如果你是印度人，贵国总理希望在2047年国家独立100周年之际，印度成为发达经济体。如果你是越南人，贵国《2021-203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提出了未来10年人均GDP年均增长7%、到2045年成为高收入国家的目标。如果你是南非人，贵国《2030年国家发展规划》设定的目标是将人均收入从2010年的2800美元提高到2030年的7000美元。其他中等收入国家也有类似的抱负。

如果这些蓝图得以实现，贵国将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或者一到两代人的时间内达到高收入水平。贵国企业将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盈利。贵国人民将以前所未有的水平消费。贫困人口将大大减少，极端贫困人口清零。在政府部门里，这些蓝图激发了极大的乐观情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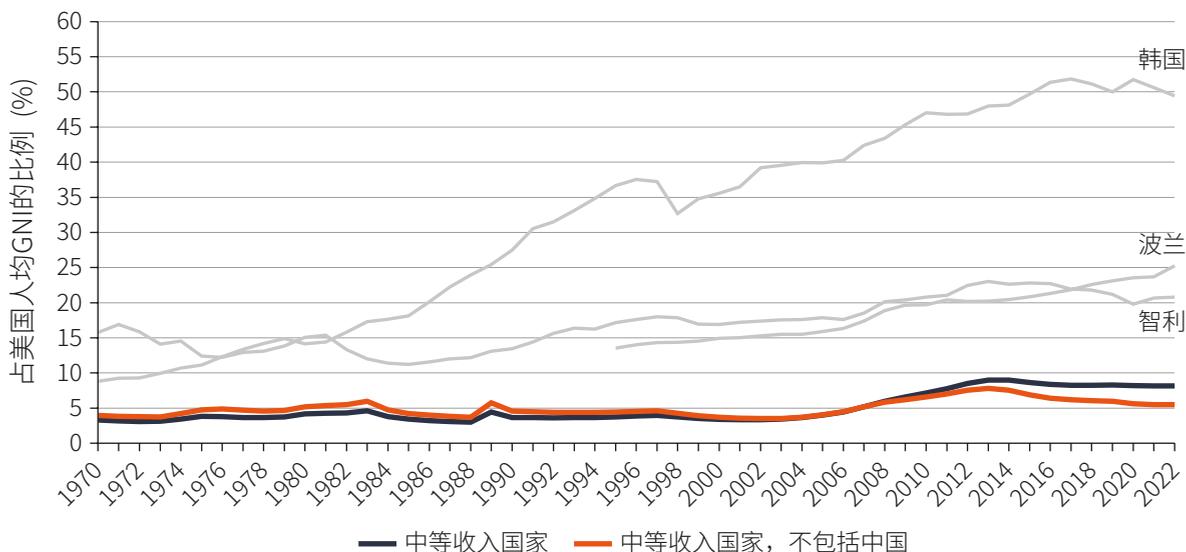
但有一个问题。

根据广泛使用的衡量指标，如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你会看到中等收入国家——包括贵国在内——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加快。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随着收入的增加，增速正在放缓，甚至每十年放缓更多。

此外，贵国的收入水平距离发达经济体并未越来越近。在发达经济体中，美国仍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收入高于美国的国家的人口总数不到2500万。自1970年以来，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中位数从未超过美国的十分之一（图O.1）。

与美国相比，中等收入国家似乎困囿于较低的收入水平。

**图 0.1 中等收入国家相对于美国的人均收入几十年来一直停滞不前**



来源：《2024年世界发展报告》团队使用WDI（世界发展指标）（数据目录）数据，世界银行，华盛顿特区，<https://datacatalog.worldbank.org/search/dataset/0037712>。

注：图中线条显示中等收入国家和不包括中国的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相对于美国（被视为经济前沿国家）人均收入的趋势。国家类别定义基于首期《世界发展报告》（World Bank 1978），其中低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为250美元或以下；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250美元以上；工业化（高收入）国家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组成，但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和土耳其除外，这些国家被归类为中等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一直以来的经济增长率没有达到在一代人时间内——甚至在两、三代人内赶上高收入国家所需的增幅。利用世界银行长期增长模型（基于著名的索洛-斯旺增长模型）进行的估算表明，如果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人力资本投资、全要素生产率、劳动参与率以及用于公共和私人投资的经济产出占比——保持近期和历史趋势，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很可能在2024-2100年间出现大幅放缓。2100年的巴西、墨西哥等国可能比现在更落后于美国。

## 一个陷阱还是两个？

世界银行目前将108个国家归入“中等收入”组别，即人均年收入在1136美元至13845美元之间的国家。<sup>1</sup>这些国家的经济活动占到全球近40%，极端贫困人口占到6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量亦占至60%以上（表O.1），他们的发展对世界的长期繁荣至关重要。

发展中经济体的结构随着规模的扩大而改变，这意味着增长速度的变化要源于他们比较陌生的新要素。尽管这些要素因国家而异，但一般而言，经济增长开始放缓，往往在达到美国人均GDP的11%左右时进入人均收入增长的平台期。目前这个数字大约为8000美元，或者被认为大约是稳定在中等偏高收入国家的水平。之后增速出现系统性放缓。主要依靠资本积累的发展战略在这些国家的低收入阶段，甚至在许多国家介于1136美元至4465美元之间的中等偏低收入阶段，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此时这一战略的收益不断递减。仅靠要素积累的策略可能会使结果持续恶化，这是资本边际生产率下降时的必然现象。

原因何在呢？设想一下，如果资本禀赋是当今中等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之间唯一的经济相关差异，那么一个典型的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GDP在2019年本应为美国的近四分之三（图O.2），事实上，这一比例仅约为五分之一。中等收入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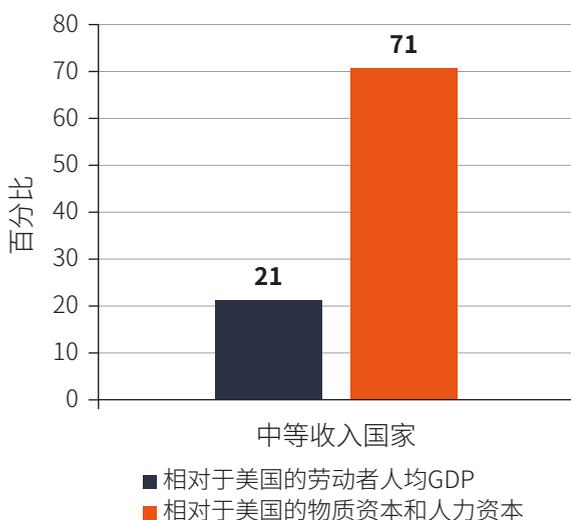
**表 0.1 2022年世界银行国家类别和部分全球指标**

收入类别	全球人口占比(%)	全球GDP占比(%)	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占比(%)	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比(%)
低收入	8.9	0.6	36.5	0.5
中等偏低收入	40.3	8.3	55.4	15.7
中等偏高收入	35.1	30.3	7.1	48.6
高收入	15.7	60.8	1.0	35.2

来源：人口占比和全球GDP占比根据WDI（世界发展指标）（数据目录）计算，世界银行，华盛顿特区，<https://datacatalog.worldbank.org/search/dataset/0037712>；极端贫困占比来自PIP（贫困和不平等平台）（仪表盘），世界银行，华盛顿特区，<https://pip.worldbank.org/home>；二氧化碳排放数据（2022），来自气候观察（仪表盘），世界资源研究所，华盛顿特区，<https://www.climatewatchdata.org/>。

注：世界银行目前认定26个经济体为低收入经济体（2022年使用世界银行图表集法计算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135美元或以下）；54个为中等偏低收入经济体（人均国民总收入在1136-4465美元之间）；54个为中等偏高收入经济体（人均国民总收入在4466-13845美元之间）；83个为高收入经济体（人均国民总收入13846美元或以上）。GDP=国内生产总值；GNI=国民总收入。

**图0.2 如果仅有资本积累就可以，中等收入国家的工作回报率将是美国的近四分之三，而不是仅五分之一**



来源：《2024年世界发展报告》团队使用的数据来自PWT（佩恩世界表）（数据库 10.1 版），格罗宁根大学经济与商业学院格罗宁根增长与发展中心，格罗宁根，荷兰，<https://www.rug.nl/ggdc/productivity/pwt/>。

注：柱状图显示中等收入国家2019年的简单平均值。数据采用Jones (2016)中概述的方法计算。根据Jones (2016)，本图基于希克斯中性和劳动报酬份额恒定为三分之二。GDP = 国内生产总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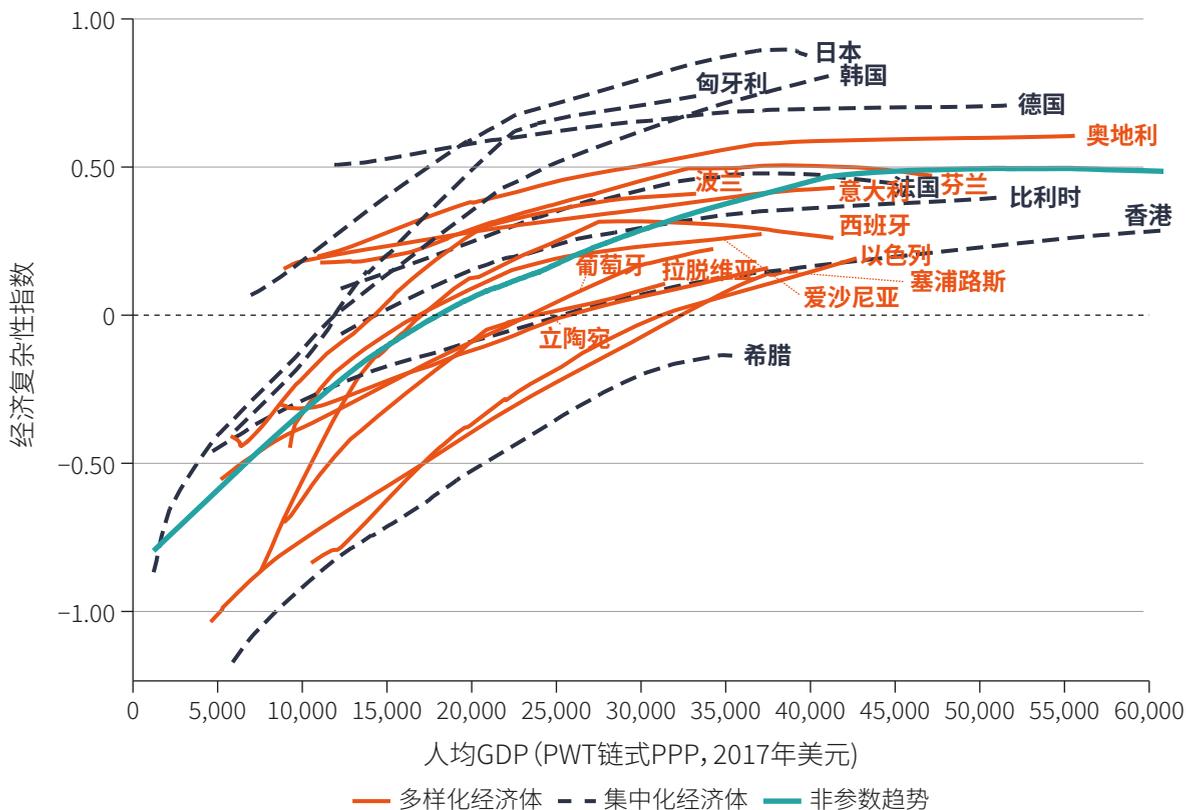
家的增长前景现在越来越取决于其是否有能力提高生产方式的复杂程度。

自2007年以来，世界银行将这种依赖性称为“中等收入陷阱”。<sup>2</sup>在过去34年里，只有34个经济体成功摆脱这个陷阱。

要想跻身高收入国家之列，中等收入国家需要提高经济结构的复杂程度。如果从一国出口篮子的经济复杂性（衡量复杂度的一种度量标准）来看，无论多样化程度如何，对于所有从人均GDP不足1.3万美元转型到超过3.1万美元的经济体来说，其出口篮子的复杂程度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图0.3）。

然而，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速正在放缓。本世纪头二十年，这些国家的年均收入增长率下降了近三分之一，从2000年代的5%降至2010年代的3.5%。<sup>3</sup>短期内情况也很难出现好转，因为中等收入国家正面临日益强劲的逆风。他们面临的挑战包括：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保护主义加剧，可能减缓知识向中等收入国家的传播，<sup>4</sup>此外还有偿债难题，以及气候变化和气候行动产生的额外经济和财务成本。

**图0.3 随着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转型，经济复杂程度越来越高**



来源: Bahar, Bustos, and Yıldırım(2024) 使用PWT (佩恩世界表) (数据库 10.1 版), 格罗宁根大学经济与商业学院格罗宁根增长与发展中心, 格罗宁根, 荷兰, <https://www.rug.nl/ggdc/productivity/pwt/>。

注: 图中绘制了各经济体从人均GDP低于1.3万美元提高到超过3.1万美元 (2019年分别为第50和第75百分位) 期间人均GDP与出口复杂度之间的关系。复杂度用经济复杂性指数的加权平均值来衡量。图中显示了多样化经济体的样本 (橙色实线) ——即经济体的终点比其起点更加多样化, 以及生产变得更加集中的经济体样本 (深蓝色虚线)。GDP=国内生产总值; PPP=购买力平价。

## 投资、引进和创新——递增渐进

为了提高经济复杂程度, 中等收入国家需要连续两次转型, 而不是一次。在第一次转型中, 以技术引进来辅助投资, 各国 (主要是中等偏低收入国家) 的主要任务是专注于模仿和推广现代技术。在第二次转型中, 要在投资、引进组合中增加创新, 各国 (主要是中等偏高收入国家) 的主要任务是加强本土能力建设, 为全球技术增加价值, 最终成为创新者。总体而言, 中等收入国家在处于中等收入的各个发展阶段需要不断调整经济增长的三大驱动力——**投资、引进和创新** (表 0.2)。

从中等收入国家晋升为高收入国家为何如此艰难? 其中一个原因在于, 在中等收入的各个发展阶段, 一个国家不可能一蹴而就地从投资驱动型增长跃升到创新驱动型增长。首先需要引进技术, 然后再创新。

### 先引进

低收入国家的经济成功很大程度上来自加快投资。随着这些经济体迈向中等收入行列, 要想继续前进, 就必须在良好投资环境的基础上, 出台专门措施, 从国外引入新的思想理念, 于本国经济发展中传播推广, 即所谓的引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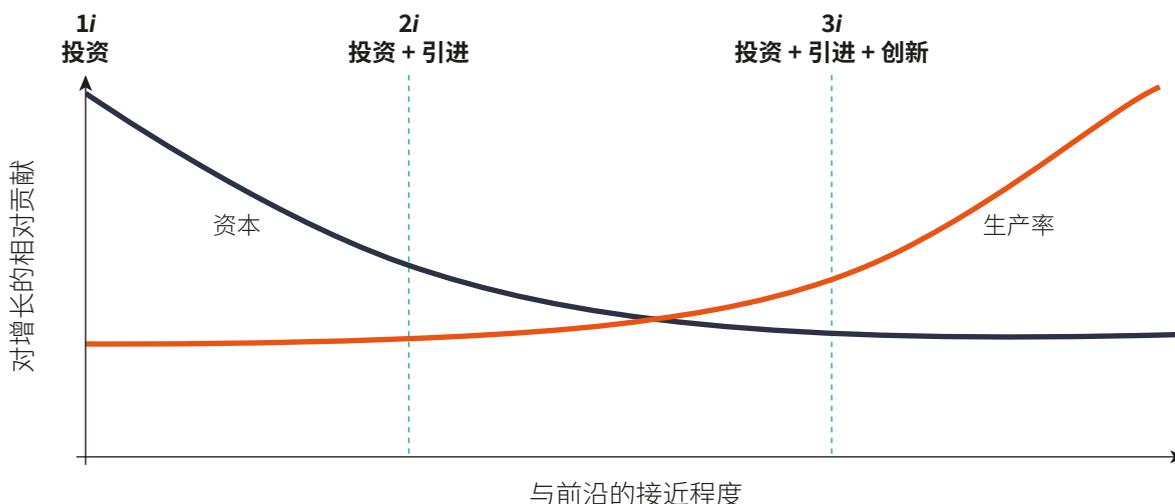
**表 0.2 要跨入高收入行列，各国需要重新调整投资、引进和创新政策组合**

收入类别	投资	引进	创新
低收入	 较高优先级	 较低优先级	 较低优先级
中等偏低收入	 较高优先级	 较高优先级	 较低优先级
中等偏高收入	 较高优先级	 较高优先级	 较高优先级

来源：《2024年世界发展报告》编写团队。

注：橙色表盘表示该收入组别的优先战略。蓝色表盘表示在成功实现优先战略之前、对该收入组别来说不太优先的战略。

**图0.4 中等收入国家晋升高收入国家必须经历连续两次转型**



来源：《2024年世界发展报告》编写团队。

注：曲线显示了根据各国与前沿（以领先经济体为代表）的接近程度，资本和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Y轴）。在x轴上越远的国家越接近前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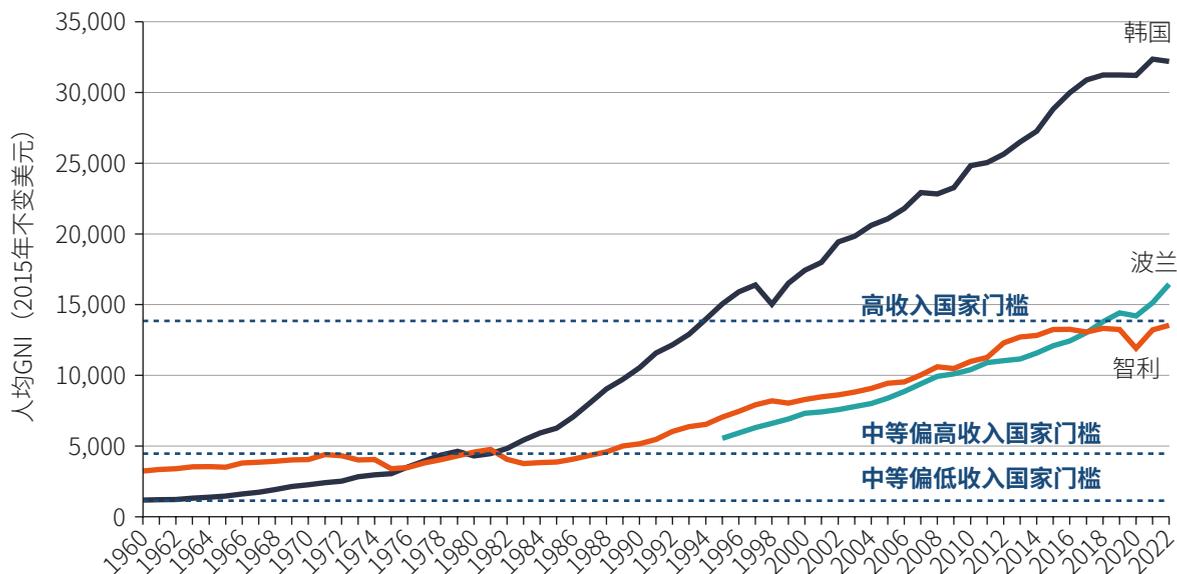
为了有意识地从国外引进最先进的技术、市场潜力信息和商业实践，并加快在国内的传播推广（图0.4），新晋中等收入经济体必须改变策略。政策制定者必须支持那些已经做好准备并能够将全球技术融入生产的企业。企业若要充分利用新技术，就需要大量技术熟练工人以及充足的工程师、科学家、管理人员和其他高技能专业人员。那些对国外经济理念持相对开

放的态度、国内中等教育和职业培训开展得扎实有力的国家，往往比其他国家发展得更好。

近几十年来，智利、韩国和波兰这三个经济体从中等偏低收入快速增长到高收入水平的经验就是以上观点的例证（图0.5）。

韩国的成功可能是对这一论点的最有力支持：保持高增长需要在加快投资的基础上推出引进政策，然后再通过创新政策来增强2组合。

图 0.5 韩国、波兰和智利在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快速增长中经历了数次经济危机



来源：《2024年世界发展报告》团队使用WDI（世界发展指标）（数据目录），世界银行，华盛顿特区，<https://datacatalog.worldbank.org/search/dataset/0037712>。

注：GNI=国民总收入。

20世纪60年代初，韩国是全球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1960年人均收入不到1200美元。到2023年，在经历了长达五十年的无与伦比的产出高速增长后，韩国的人均收入已增至约3.3万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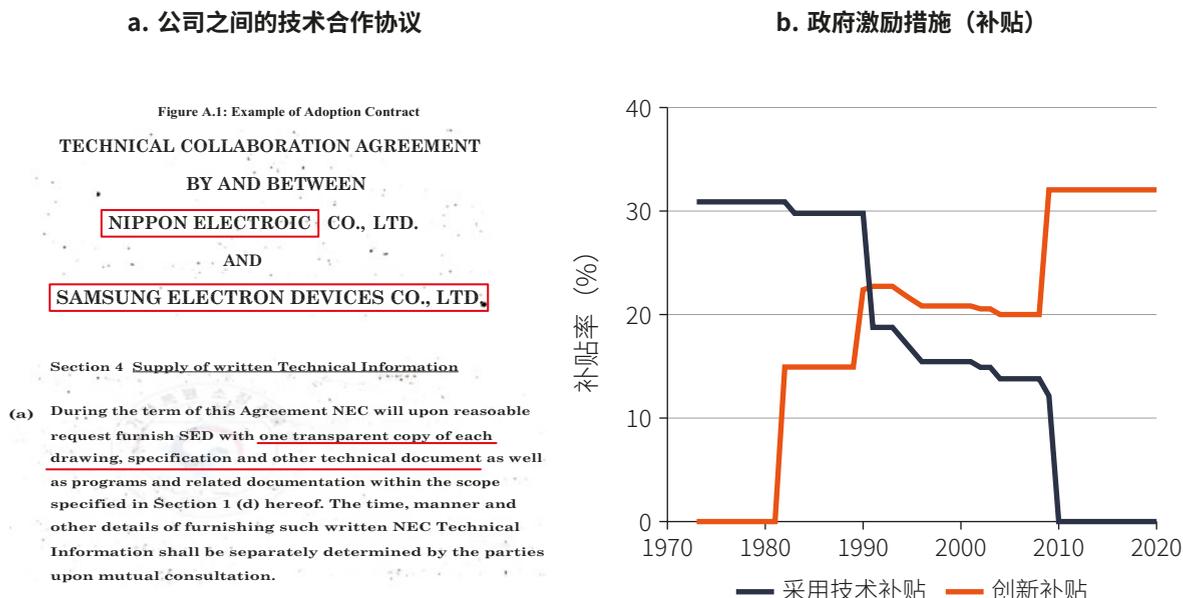
1960年代，韩国出台了一系列增加公共投资和鼓励私人投资的措施，就此开启了增长之路。<sup>5</sup>1970年代和1980年代，韩国经济增长得益于高投资率和引进的有力组合，以及鼓励企业采用外国技术的产业政策（图O.6）。企业支付特许使用费可获得税收减免，家族企业集团（或称财团）带头从国外（主要是日本）引进技术。随着这些企业集团迎头赶上外国公司，它们开始遭到其昔日技术提供者的抵制，于是韩国产业政策转向支持创新的3i战略。随着企业生产更加先进的产品，它们需要专业的工程和管理人才。教育部为此行动起来，通过公立大学体系和对私立学院的监管，教育部制定目标，增加预算，监测对这些技能人才的培养情况。这些企业还需要更多的专业化资本：对于

一个成长中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来说，投资仍然很重要。

波兰的情况又有不同，因为它既有社会主义的过去，又是欧盟的成员，而欧盟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经济体联盟。其收入的快速增长是众所周知的，类似韩国的从1i到2i再到3i的转型也清晰可见。

1990年代，波兰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此后，其人均收入从欧盟平均水平的20%提高到了50%。波兰的制胜战略是什么？首先是整顿大型国有企业。通过削减补贴、收紧银行贷款和放宽进口竞争来加强国企的预算约束，其中就包括诞生了团结工会的标志性的格但斯克造船厂。整顿为全面改革铺平了道路。国企管理者将重点从生产目标转向盈利能力和市场份额，并通过提升企业能力为私有化做准备。<sup>6</sup>波兰在此基础上吸引投资，之后重视引进，最后转向创新。在这一渐次展开的过程中，波兰主要通过从西欧引进技术来提高生产率，2000年代波兰加入欧盟共同市场，刺

图 0.6 韩国: 从引进到创新



来源：图a：韩国国家档案馆，<https://www.archives.go.kr/english/index.jsp>。图b：Choi and Shim 2024。

注：图b显示了采用税收抵免率和公司税率计算得出的技术采用补贴率和创新（研发）补贴率。例如，30%的补贴率表明企业可以报销相当于其采用费或研发支出30%的费用。

激了外国直接投资，使得这一进程加速。波兰的高等教育率也从2000年的15%提高到2012年的42%。接受了良好教育的波兰人将就业范围扩展到了整个欧盟，开辟了另一条将全球知识注入波兰经济的渠道。

智利的成功也有类似的特点。2012年，智利在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仅两年后，成为第一个达到高收入水平的拉美国家。在1960年代，智利采矿业约占出口的五分之四，之后其出口不断增长并实现多样化。现在这一比例约为一半。来自发达经济体的知识转移得到了公共和私营机构的支持。政府部门智利出口促进总局支持中小企业发展，2013-2016年中小企业贡献了三分之一的出口增加值，另外三分之二由国内大型出口企业贡献。<sup>2</sup>成立于1976年的智利基金会是一家私营非营利组织，致力于帮助国内企业获得转让技术。例如，通过因地制宜地改造挪威三文鱼养殖技术，使智利成为了世界领先的三文鱼出口国。

## 再创新

一旦发现经济中最有前景行业的引进潜力挖掘殆尽，即用尽了可供学习和采用的技术，中等收入国家就应进一步努力成为创新型经济体。但这次转型与前一次转型一样或甚至更加艰难。<sup>8</sup>

引进主要通过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流动中所涉及的技术转让来推动。创新需要这两种资本的流动，但还需要更加活跃的人力资本交流——通常通过与散居海外的移民重新建立联系开启这种流动，以及营造创新者所珍视的环境，如更自由的经济、人权和宜居的城市。此外，为使企业能够创新，政府必须在引进阶段做大量工作，改革和加强体制机构。薄弱的体制机构与过早尝试从投资跨越到创新一样有害于经济。在某些情况下，忽视引进的必要性而一味加速创新甚至会恶化投资环境，使中等收入经济体倒退数年甚至数十年。拉丁美洲，中等收入陷阱肇始之地，就是令人警醒的例证。

在上世纪70年代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巴西走向了错误的方向。其政策制定者试图绕开引进外国技术，而直接鼓励企业创新。2001年，巴西政府实施了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战略，部分原因是担心外国技术会加剧国内不平等，并导致对北大西洋发达经济体的依赖。尤其突出的是，巴西对购买国际知识产权的支出征收10%的边际税率。这些税收收入被用来补贴生物技术、航空、健康、农业等目标行业的创新。<sup>2</sup>

一项研究发现，补贴刺激了巴西专利局专利申请数量的迅速增加，但结果却是这些专利质量低下，缺乏与全球市场的关联性。此外，随着经济中申请专利的企业比例增加，技术工人的工资溢价下降，增加值也随之下降。<sup>10</sup>

巴西自身举步维艰之时，韩国却在全球势如破竹，用引进外国技术为国内创新奠定了基石。1980年，韩国工人的平均生产率仅为美国工人的20%。到2019年，这一比例增加了两倍，达到60%以上（图O.7）。相比之下，1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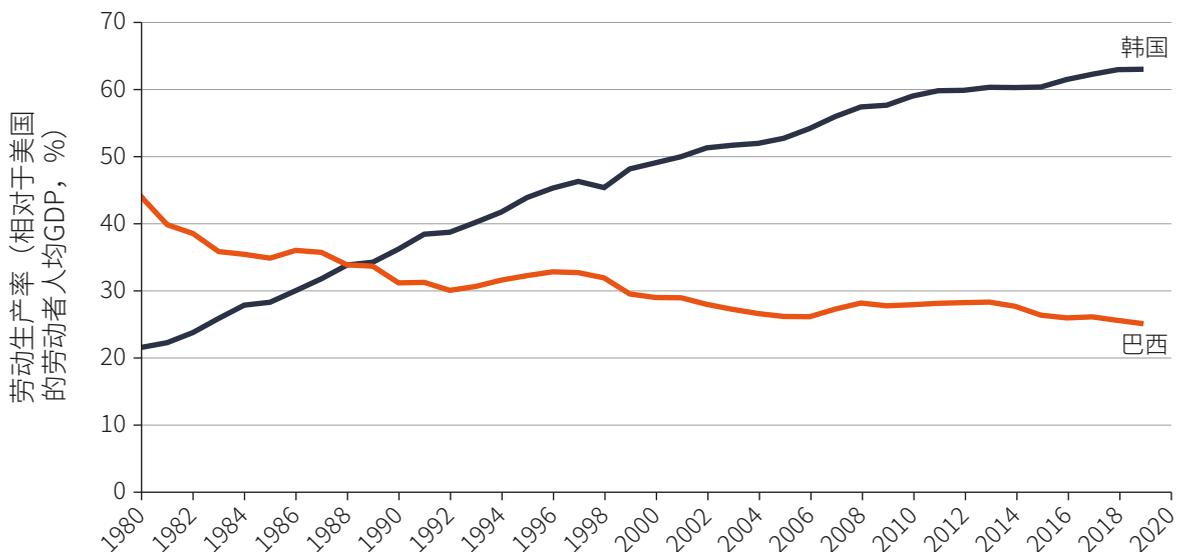
年巴西工人的生产率是美国工人的40%，而到了2018年却仅为25%。

走向创新之路没有捷径。工业政策不太可能使一个国家从投资和制造业出口驱动型模式，一跃变成创新导向模式或服务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发展文献中充斥着此类观点，建议从投资飞跃到创新，跳过令人痛苦的吸收外国投资和理念的改革阶段。但是，试图让本国公民免受改革开放之痛的中等收入国家政府，也使其公民无法获得持续增长带来的收益。

## 创造性破坏经济学

从  $1i$  到  $2i$  再到  $3i$  战略的转型道路崎岖而曲折。转型需要有经济、社会、政治三方面变革的支持，卡尔·马克思等哲学家认为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认为市场化经济将因财富日益集中而千疮百孔，危机四伏，直到资本主义被共产主义取代。约瑟夫·熊彼特以其

**图O.7** 过去40年里，韩国相对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持续攀升，而巴西的劳动生产率则在达到峰值后下滑



来源：《2024年世界发展报告》团队使用的数据来自 PWT（佩恩世界表）（数据库 10.1 版），格罗宁根大学经济与商业学院格罗宁根增长与发展中心，格罗宁根，荷兰，<https://www.rug.nl/ggdc/productivity/pwt/>。

注：GDP = 国内生产总值。

1942年的专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与其中提出的“创造性破坏”现象改变了这一论调。<sup>11</sup>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可能既是痛苦的，又是具有恢复性的。

近一个世纪后，熊彼特的许多洞见似乎得到了证实。事实上，现代的熊彼特学派理论家——最突出的是 Aghion and Howitt (1992) 和 Akcigit and Kerr (2018)——已经使用他的告诫和洞见来构建正式框架。增长理论的这些进步有助于解决当今全球经济面临的最棘手问题：108个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口占世界的75%，碳排放量占全球的60%，但产出仅占全球的40%，这些国家应如何纠正这些失衡，同时向发达经济体的生活水平靠拢？

熊彼特学派的理论提供了有用的线索。成功似乎最快地来到那些平衡了创造、守成和破坏三种经济力量的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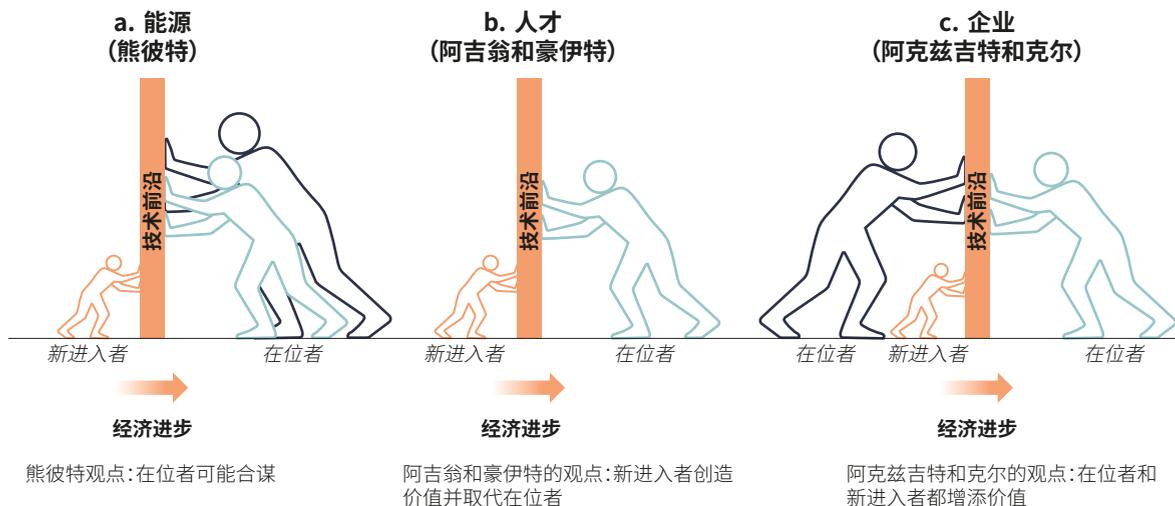
### 能源：在位者可能合谋 (熊彼特的观点)

熊彼特在 Joseph Schumpeter (1942) 中写道，有才华和远见的企业家推出新产品和新技术，取代旧产品和旧商业模式，带来更高的生产率

和增长率，让整个社会从中受益。然而，在位者往往合谋以维持现状(图O.8, a)。在当今的环境中，熊彼特的观点或许在高碳能源和低碳能源的较量中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体现。高碳能源，特别是煤炭，是统治了世界300多年的在位技术(专栏O.1)。在技术进步的道路上，化石燃料的开采和燃烧效率不断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围绕私家车而建，社会态度和个人偏好支持高碳消费，政治压力团体代表着碳密集型产业的利益。结果是，由于此前大量的互补性高碳投资，投资高碳活动的回报变得很高。

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的电力市场仍然处于垄断状态：由公用事业部门通过所辖的国有企业垂直一体化地掌控发电、输电、配电、售电等各个环节。这种模式阻碍竞争，造成资源使用效率低下。此外，在许多中等收入国家，最先调度的发电机组往往不是那些边际价格较低的发电机组(即电力调度通常不遵循优先交易顺序)，这就阻碍了成本快速下降的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在巴基斯坦、波兰、南非、土耳其等国，国有企业的装机容量占总量的84%。相比之下，私营部门拥有大约相等份额(80%)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sup>12</sup>

图 O.8 关于创造性破坏的三种观点



来源：《2024年世界发展报告》编写团队，基于 Schumpeter (1942)；Aghion and Howitt (1992)；Akcigit and Kerr (2018)。

## 专栏 0.1 谁是在位者？什么是在位者？领先的企业、技术、国家、精英——还有男性

在位者是企业，这些企业通常拥有消费者认可和信任的知名品牌。它们通常更容易获得金融资源，如用于投资和技术引进的资金，也更容易获得人力资源，如有经验的雇员。它们还可能与供应商和分销商建立了稳固关系，这些关系可以用来保持竞争优势。他们有资源投资于研发，发明可以用专利保护的产品和工艺。

在位者是长久以来使用的能源，如化石燃料。自1709年英国人亚伯拉罕·达比首次用焦炭炼铁以来，煤炭一直是世界各地的首选燃料。在之后的300多年里，煤炭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力来源，2022年提供了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电力。<sup>a</sup>城市和经济建立在廉价的煤电能源之上，煤电为繁荣提供动力。然而，煤炭的广泛使用产生了最高的能源相关二氧化碳排放量——155亿吨——占2022年总排放量的42%。

在位者是技术先进的国家。这些国家可以通过投资、发放许可证、培训和接收外国学生等方式与新兴经济体分享技术。几十年来，他们在支持新兴经济体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如今，这些国家正在筑起高墙，补贴本国企业，阻止外国企业加入其价值链。

最后，在位者是社会精英。他们有权有势，一般都很富有，在中等收入经济体大多数是男性。但他们并非都反对进步。精英阶层可以凭借其教育水平和资源，通过将全球技术引入本国经济体来加快增长。对于一个寻求引进和创新的中等收入国家来说，精英阶层可以成为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管理者、企业家和创新者的首选人才库。男性也是在位者，几个世纪以来，他们比女性享有更好的教育和就业机会，并制定法律和制度，而这些往往帮助他们赢得了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这些权力给了他们很大的话语权，他们可以决定何人在哪里学习，学习什么，何人得到一份高薪工作，何人可以创业。同时，厌女症可能会阻止女性进入市场，或者至少被排除在最理想的就业和商业机会之外。

然而，大型企业、社会精英、有权势者和发达经济体也会帮助新进入者。企业的规模和所有权以及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性别都不是可靠的依据，不能作为制定政策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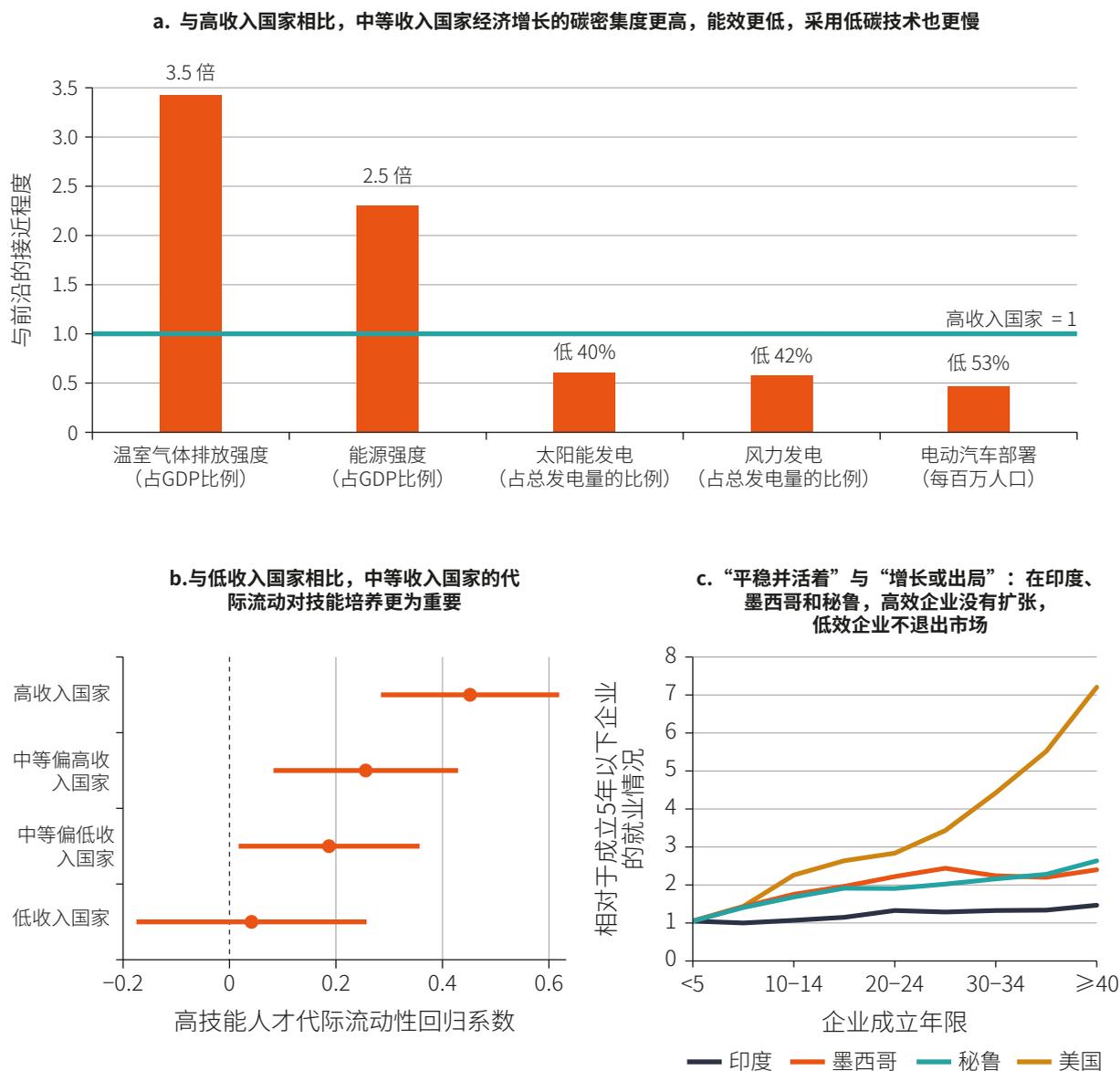
a. IEA (2023).

尽管低碳能源的进步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但低碳技术并未在中等收入国家全面铺开，这反映了这些国家实施的主要还是维护高碳经济的传统政策。中等收入国家的GDP温室气体强度是高收入国家的3.5倍。这一差异既反映了能源使用分配不当（GDP能源强度是高收入国家的2.5倍），也反映了低碳能源技术的普及程度较低（图O.9，a）。

## 人才：新进入者创造价值并取代在位者（阿吉翁和豪伊特的观点）

熊彼特关于创造性破坏的思想启发了经济学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论文之一，这篇论文来自两位经济学家之间的偶然合作。1987年夏天，麻省理工学院的新任教授菲利普·阿吉翁和加拿大经济学家彼得·豪伊特正式提出了一种创造性破坏理论，即经济主要通过新

**图 0.9 中等收入国家资源分配极其不当，创造力量不足**



来源：图a: Chepeliev and Corong 2022; Energy Institute 2023; 统计数据 (门户网站),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 阿布扎比, 阿联酋, <https://www.irena.org/Data>; WDI (世界发展指标) (数据目录), 世界银行, 华盛顿特区, <https://datacatalog.worldbank.org/search/dataset/0037712>。图b: 《2024 年世界发展报告》编写团队估算, 基于GDIM (全球代际流动性数据库) (仪表板)、数据目录, 世界银行, 华盛顿特区, <https://datacatalog.worldbank.org/search/dataset/0050771/global-database-on-intergenerational-mobility>。图c: 印度、墨西哥和美国: Hsieh and Klenow 2014; 秘鲁: World Bank 2015。

注：在图a中，指数1代表高收入国家前沿水平，图中显示了中等收入国家与之相比的各项指标情况，包括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GDP能源强度、太阳能风能在总发电量的占比，以及每百万人口的电池电动汽车数量。图b绘制了不同国家组别的代际流动性的回归系数 (等于1减去代际相对流动性)，置信区间为95%。回归中的因变量是高技能人才的比例 (“立法者、高级官员、管理人员”；“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和助理专业人员”)。回归控制了1980年代出生队列成长过程中的人均GDP对数。代际流动性估算针对的是世界银行GDIM中1980年代队列的教育流动性。图c显示了不同国家各组不同年限的企业平均就业情况。以雇员人数代表企业规模。Y轴报告了每组企业相对于成立五年以下企业的平均就业率。

进入者的创新而扩张。<sup>13</sup>新进入者通过挑战在位者，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图O.8，b）。

创造性破坏理论强调，既要不断扩大人才储备库，也要改善任务分配，做到人尽其才。不投资于女性和少数群体的才能，将其排除在收益最高的活动之外，再加上实行不公平的薪酬实践，对本就缺乏人才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来说，无疑是最自拆台脚的做法。而如能摒弃这些做法，将会带来巨大的回报。在美国，1960年至2010年间，教育和职场中性别和种族歧视现象的减少，对于该时期增长的贡献率高达40%。<sup>14</sup>

随着经济增长，中等收入国家需要工程师、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高技能人才，但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等收入国家的高技能人才储备较少。然而守成力量阻碍了汇聚人才。通过教育、培训和工作经验培养出的人才如果不按才能、而是根据其他个人无法控制的因素配置，这些人才就会被浪费。在一个渴望通过引进和创新实现快速增长的国家，不应该让性别、家庭背景、族裔、文化特性等因素影响入学或职业前景。但对于当今中等收入国家的普通儿童来说，这些因素影响极为重大。

经济和社会流动性较好的社会更利于开发技能和利用人才，而中等收入国家的社会流动性比发达经济体低约40%。<sup>15</sup>中等收入国家需要确保更多的个人，无论其家境如何，都有更好的机会成为高技能人才。中等收入国家的社会流动性比低收入国家更为重要，原因很简单，前者需要更多的高技能人才来投资、引进、创新和发展（图O.9，b）。

为什么守成势力会持续限制这么多人的机会？部分原因在于，在一个更加开放、任人唯贤的社会中，社会精英的财富和特权优势可能会被削弱，而守成则可以使他们免受这些破坏力量的影响。守成势力确保，除了精英之外，鲜有孩子有机会在国家的收入阶梯上攀上比其父母更高的位置。正因如此，收入差距居高不下，社会流动性保持低位，不平等现象代代相传，加剧了机会的不平等。

在中等收入国家，有三种守成力量抑制社会流动，将人才排除在经济创造之外。第一种力量是**规范**——通过偏见剥夺或限制妇女和其他边缘化群体成员的机会。其次是**关系网络**，尤其是家族关系。最后一种是**社区**——在获得教育和就业机会方面的区域性差距。尽管这三种因素都能对人才创造产生积极影响——填补缺失的市场和服务留下的空白，但当这些因素阻碍弱势群体获得机会时，它们就会成为守成力量。

### 企业：在位者和新进入者都增添价值 （阿克兹吉特和克尔的观点）

最初的熊彼特假设是，新进入者推动变革并创造新的经济潜力，在位者则尸位素餐，而这并不符合最新的企业经验证据。全球范围内，规模更大、更成熟的企业在其业务中注入新知识的速度要快于小企业。在中等收入国家，大型企业雇用了大部分高技能人才。<sup>16</sup>在整个20世纪，美国利用风险管理、市场准入、品牌声誉、协调合作等优势，卓有成效地将创新核心从在车库里创业的个人转移到成熟的公司。这些公司目前占到在美国专利商标局申请的专利的75%以上。<sup>17</sup>

第三代熊彼特学派经济学家正式提出了在位企业和新企业都能创造价值的观点（图O.8，c）。<sup>18</sup>在市场居主导地位的企业，即成功的在位企业，可以通过投资升级产品、商业实践以及面向新市场的技术，实现**规模效应**，推动国内产业的发展。有了规模，就有利于采用现代管理实践，有利于雇用和奖励熟练工人，有利于使大量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换句话说，规模赋予了在位企业提高效率的能力，无论是在预判其他在位企业或新进入者的竞争的情况下，还是在应对这些竞争的情况下。规模也使在位企业能够经营多个产品线，以便及时调整路线对抗竞争对手的新产品。

然而，中等收入国家的创造力量较为薄弱。例如，在印度、墨西哥和秘鲁，一家经营了40

年的企业，其规模大约翻一番。而美国能存活这么久的企业平均会增长七倍（图O.9，c）。对于中等收入国家的企业来说，这意味着一种“平稳并活着”的态势：未能大幅增长的企业仍然可以生存几十年。相比之下，美国企业的态势是“增长或出局”：面对强大的竞争压力，少数企业家快速攻城略地，而其他大多数将迅速退出。退出市场的大多数人将进入最蓬勃的企业，成为工薪劳动者。

与平稳并活着的态势一致，印度、墨西哥、秘鲁的企业往往停留在微型企业状态：近九成企业的员工少于5人，只有极少数企业员工达到10人或以上。规模不足的企业（其中许多是非正规企业）长期存在，其原因在于市场扭曲，这种扭曲导致企业规模过小，同时让太多企业存活下去。例如，正规企业成长过程中的过高监管成本可能阻碍一个高效企业获得市场份额，淘汰低效的竞争对手。在中等收入国家，这种由政策引起的扭曲导致资源分配不当，有碍于大规模的创造和引进。

## 平衡三种力量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等收入国家在平衡三种力量方面面临着共同的挑战：

- **在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创造力量——经济增长的主角——比较薄弱。**大型在位企业在开发新产品和新工艺方面进展缓慢，尽管小企业不断进入各种市场，但大多数并不创造也不颠覆。增长期也是创造期，因此也是结构变化的时期。
- **中等收入国家的守成力量——创造的最大阻碍——最强大。**那些本可以促进中等收入国家加快引进全球知识的市场领导者，却往往拖慢了这一进程。在位企业和精英或者通过市场力量和合谋勾结，或者通过捕获政策和法规，亦或通过更加重视社会经济地位而非才能或价值的教育体系和劳动力市场，经常成功地保持现状。

- **破坏力量——一种必要的恶，通过释放错配的资源 and 扫除过时的机构，为创造扫清道路——在中等收入国家因拥有市场力量或政府影响力的势力的反对，而处于弱势状态。**不断增长的经济需要在资本、劳动力和能源市场上做出新的安排，因此需要挣脱效率较低的旧安排。如果薄弱的体制和政策维持过时的安排，创造性破坏就会被扼杀。然而，这种扼制力量在危机期间往往会被削弱——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生态危机。当危机给政府带来采取行动的的巨大压力时，改革的窗口就会打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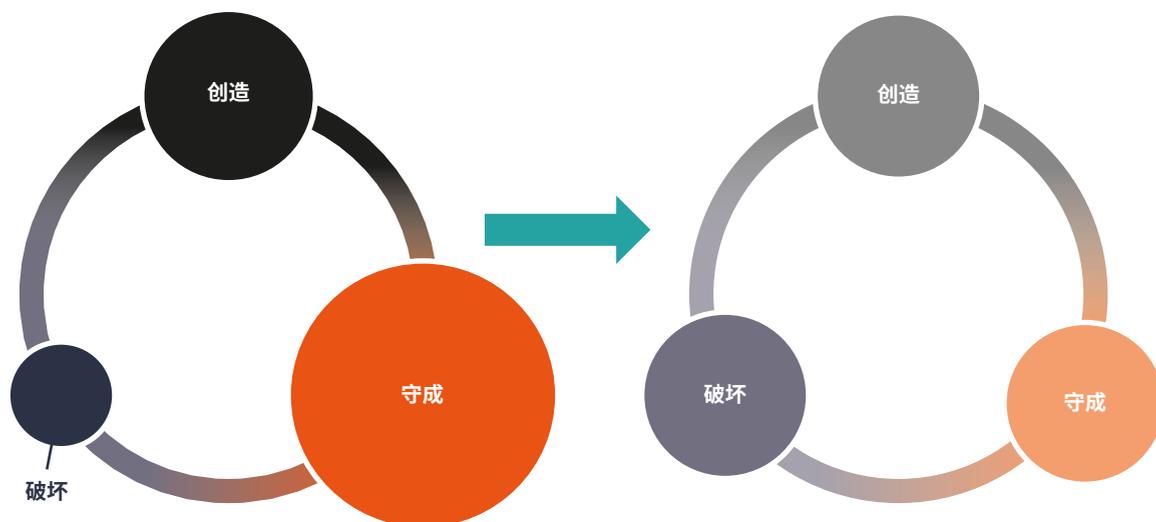
## 保持适当的平衡

创造、守成、破坏这三种力量失衡，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中等收入国家创造力量弱小，守成力量强大，而破坏力量被守成力量所束缚。因此，中等收入国家必须平衡这些力量（图O.10）。这意味着：

- **约束在位者，削弱守成力量**
- **奖励有益举措，**即那些对整体福祉有积极影响的活动，那些有助于有效利用才能、资本和能源的活动，以加强创造力量
- **善用危机，**帮助摧毁繁荣时期难以摆脱的过时政策和体制。

这些原则可以帮助中等收入国家持续不断校准**投资、引进和创新**政策组合，以保持经济稳健增长。鉴于在位企业和新企业都能增加价值，产业政策需要侧重于约束在位企业。此外，由于女性和弱势群体的才能远未得到充分利用，社会政策需要更加注重奖励她们的有益价值，促进社会和经济流动性。最后，由于过去三个世纪排放密集型的经济增长，中等收入国家需要利用今天的能源危机减少排放，同时平衡能源获取和安全需求。

图0.10 中等收入国家必须在创造、守成和破坏之间保持平衡



来源：《2024年世界发展报告》编写团队。

## 企业、开放和改革

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往往采取加快投资的1i战略。这一阶段需要更强有力的机构体制来控制通货膨胀，确保金融和宏观经济稳定，扩大经济和政治自由，实行法治以鼓励国内外投资。但即使所有中等收入国家都具备这些有利条件，光靠1i战略也无法实现持续增长和晋级高收入国家行列。为什么呢？因为单纯来自资本投资的回报会稳步下降。在投资和引进并重的2i战略支持下，当经济呈现新的结构时，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就会得到提振。国家机构需要打造一个有利于将全球技术引进国内经济的环境。

### 开放成为可竞争市场

可竞争的市场——以及支持竞争的体制——对于旨在成为全球供应商并通过复杂性和规模效应维持快速经济增长的中等收入国家至关重要。

可竞争性不是混乱：并不意味着中等收入国家的企业不能获得舒适的市场地位，不能站稳脚跟，变得更难被取代。然而，可竞争性确实意味着企业感受到竞争压力，因为它们目前的

产品和工艺可能会被来自其他国家的技术先进的制造商所取代。这种可竞争性是创造性破坏的核心。

可竞争性的一个关键部分是向外国投资者和全球价值链开放，使国内企业有机会进入更大的市场、获得技术和专门技能，从而增加价值和实现增长。鼓励国内企业利用这种机会，这样使它们在直面竞争的同时，亦能从处于或接近全球技术前沿的国际公司获得启发。国内企业可以抓住机会，引进技术，提高运营复杂性，扩大规模，也可以继续固守常规，但逐渐被淘汰出局。

例如，从2001年到2007年，智利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年均增长27%，同时本国在位大企业或市场领导者的产品创新提高了15%，产品质量提高了22%。<sup>19</sup>在阿根廷，南方共同市场成立后，削减出口关税行业的国内企业开始更多地投资于计算机技术以及技术转让和专利。<sup>20</sup>同样，在2000年至2007年的12个欧洲国家中，超过15%的专利申请、信息技术强度和生产率增长由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推动——成功的欧洲企业在提高管理质量的同时，还增加了研发投入，增添了新技能。<sup>21</sup>

### 帮助本地企业与市场领导者建立联系

当地企业往往不了解具体技术的信息，也不掌握采用这些技术的诀窍，由专家创办的顾问和咨询公司可以提供技术采用和实施方面的专业知识和建议。市场领导者，尤其是跨国公司，往往是最先掌握科技和技术能力的先锋，它们可以成为当地企业的最佳合作伙伴，共同部署新技术。政府可以帮助牵线搭桥。例如，智利的“供应商发展计划”鼓励国内大型采购企业与中小企业供应商建立合作关系，使供应商销售额增加了16%，雇员人数增加了8%，同时也使相关大型采购企业的销售额提高了19%。<sup>22</sup>政府还可以为企业提供免费市场机会信息，使企业能够获得融资，加强能力，识别机会并使出浑身解数抓住机会。<sup>23</sup>

### 减少要素和产品市场监管过度

实施改革，减少对特定活动、企业、家族或行业的保护，可以增进开放的收益。然而，今天中等收入国家在守成的强大体制及监管力量的掣肘下，兼顾投资与引进、创新的政策进展很慢。掣肘最严重的是产品市场法规。除了对国际贸易和投资施加限制外，这些法规还支持国家对商业的控制，设置有碍创业的法律和行政壁垒，从而阻挠了大规模的投资和引进。

### 不溺爱小企业，不抹黑大企业

中等收入国家有很多中小型企业。理想情况下，补贴将帮助中小企业成长为规模更大、生产率更高的企业，这些企业支付更高工资，善于引进吸收知识。但同样的支持也会加强守成力量，降低高生产率企业扩张的动力，使其不愿扩大生产规模。中等收入国家的许多企业即使成立已久，规模依然很小，它们根本不渴望发展壮大。<sup>24</sup>中等收入国家的小企业数量众多，但这并不仅仅反映所面临的挑战，而且还表明了缺乏来自较大企业的竞争，如果大企业扩张，就会在市场上淘汰小企业。<sup>25</sup>对小企业的一揽子支持可能会阻碍生产率低下的小企业的退出，反而使其延续小型化，排挤其他企业进入，并造成资源分配不当。<sup>26</sup>在

日本、墨西哥、越南等国，政府对小企业（不一定是年轻企业）的支持降低了生产率，加剧了资源错配。<sup>27</sup>

即使在税法没有根据企业规模做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中等收入国家也可能通过取决于规模的税收执法为中小企业提供实际补贴，也就是说，征税能力薄弱的政府可能会将执法重点放在规模较大的企业上。<sup>28</sup>在墨西哥，消除利好小企业的取决于规模的税收政策造成的扭曲，可以使产出提高9%。<sup>29</sup>在智利、中国和印度，减少扭曲帮助这些经济体将实际生产率与潜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缩小了10%。

### 淘汰生产率低的企业

让低效的企业和商业模式失败是创造性破坏的核心原则。对企业退出的研究——源于Hopenhayn (1992)的开创性工作——表明，生产率较低企业的退出对提高总体生产率有很大贡献。在许多国家的贸易自由化时期，生产率最低的企业退出促进了增长。<sup>30</sup>然而，在中等收入国家，官僚现象延长了僵尸企业的存续时间，而这些效率低下、负债累累的企业挤出了高生产率企业的投资。<sup>31</sup>破产法改革的重点应放在让濒临倒闭的企业能够迅速、可预测地退出，并允许有生存能力的企业进行重组。

### 加强竞争管理机构

随着各经济部门精熟引进之道，接下来就要采用3i战略。机构体制可以促进新技术发展，并确保新进入者（新企业家）不受根基牢靠的在位企业、监管壁垒和根深蒂固的行业惯例的阻碍。反垄断法有助于防止既有企业滥用市场主导地位。随着经济（或行业）向技术前沿靠近，竞争管理机构需要考虑创新激励与市场力量之间可能存在的权衡取舍。<sup>32</sup>尽管市场力量会投资研发，将新想法带入市场，但企业可能采取反竞争行为。因此，在建立独立精干的竞争管理部门的同时，还需要协调竞争和创新政策。

对于转向3i战略的中等偏高收入国家来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如何防止扼杀式收购，即在位企业为了扼杀未来竞争产品和技术而收购创新公司。<sup>33</sup>但并非所有的收购都是致命的：许多年轻企业家致力于被在位企业收购——他们做出具有互补性的创新，供在位企业扩展使用。

### 深化资本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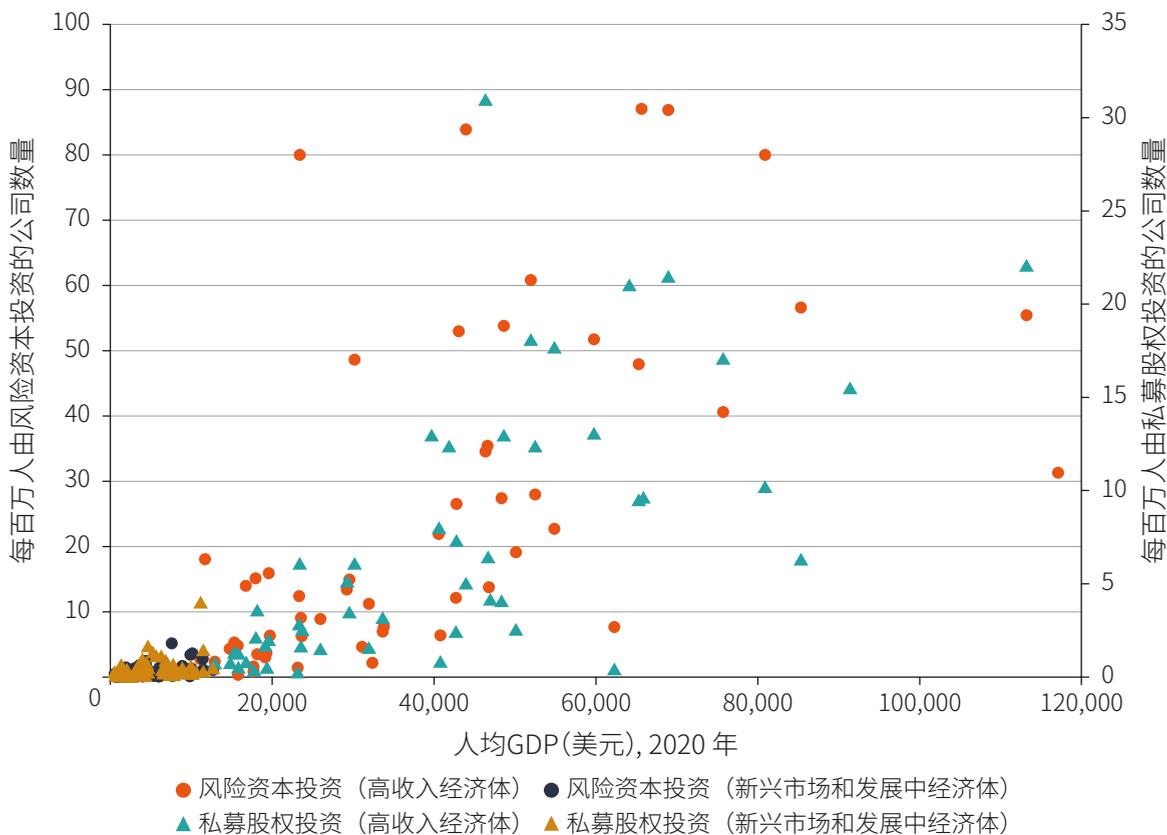
从2i 战略转向3i 战略也会对企业如何获得融资产生影响。股权市场在支持创新活动方面，特别是私营企业的创新活动，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因为这些企业的融资缺口往往比上市公司严重。然而，新兴经济体的私募股权融资市场

缺乏深度和渠道（图O.11）。初创企业孵化器和加速器会特别有用，这些机构可以提供指导、资源、人脉机会，有时也提供资金来帮助初创企业成长和竞争。

### 教育、社会流动性和创业

随着越来越多的经济部门从1i战略转向2i和3i战略，对高技能人才（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科学家和其他专业人员）的需求也随之增加。这种需求可能会加剧收入不平等。但是，如果同时制定政策，扩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减少女性和其他弱势群体面临的障碍，使其技有所值，能够创业，就会提高社会流动性。<sup>34</sup>这样的

**图O.11 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很少有企业获得风险资本或私募股权投资**



来源：Didier and Chelva 2023。

注：图中显示了在2018-19年完成的交易中，由风险资本（左轴）和私募股权（右轴）投资的公司数量。经济体类别基于世界银行截至2020年6月的收入分类（Serajuddin and Hamadeh 2020）。GDP = 国内生产总值。

环境既有利于社会稳定，也会激发经济活力，两者对于中等收入国家进一步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同等必要。事实上，社会流动性障碍可能使一个国家无法推进超越1战略的计划。

### 约束而非抹黑精英

社会和经济精英可以是创造的力量，也可以是创造的阻力。对于希望快速充实人才库的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打压精英的雄心壮志相当于自毁长城。精英阶层最有能力投资子女教育，而且投资越高，投资选择越好，家庭背景的回报就越高。<sup>35</sup>精英人脉深厚，在求职和职位安排方面都享有优势。精英女性最容易通过教育和专业工作成为其他女性的榜样。然而，精英阶层——就像大型既有企业一样——需要受到约束，因为他们拥有把持体制机构的力量。如果精英阶层独占教育、就业、资本、资产等资源，限制其他人获取渠道，那么中等收入国家就沦为精英把持：精英们要维护特权，就会阻碍创造。

### 投资于人才，奖励有益举措

那些不仅才华横溢，而且——至关重要的一——受过良好教育、拥有多种渠道资源（劳动力市场、企业机会和商业融资）的人才是2和3战略的关键因素。政策制定者尤其应考虑采取政策措施，为妇女以及其他被排斥和边缘化的群体提供教育机会，使家庭的社会和经济流动性随着每一代人而不断提高。

基于那些已成功进入高收入行列的中等收入国家的经验，可以总结出教育改革的三条基本原则：

- **拓宽获得基础技能的渠道。**增加高中毕业生人数，扩大深化人才储备。
- **使用学生评估来监测学习效果。**设立明确的政策目标，衡量实现这些目标的进展情况。
- **将教育改革纳入国家经济增长战略。**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芬兰经济对资源和农业的依赖程度降低，城市化

和工业化程度提高，芬兰推行了教育改革，以满足企业和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需求。

充实人才储备需要时间，以往的失策可能会阻碍国家几十年的发展。尽管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已经扩大了高等教育规模，但那些成功晋升到高收入行列的国家和那些未能晋升的国家之间的一个关键区别是，前者从未动摇过对基础技能的投入，并因此培养了大量人才。对儿童来说，错过在校期间的学习机会基本是不可逆转的；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可能再没有机会学习了。加强基础技能培养需要在教育上进行高效和有效的支出，因为支出本身并不能保证改善学习成果。<sup>36</sup>各国可考虑采用“渐进式普及”原则：随着初中等教育质量的提高，逐步增加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以吸纳更多的学生。

与此同时，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等收入国家不仅缺乏人才，在人才配置、人尽其才方面也大为逊色。例如，在这些国家，拥有才能的女性和来自弱势家庭人员得不到足够的酬劳，同时在教育竞争中那些家庭条件优越但能力较差的人得到更多保护。

针对才能得不到开发或酬劳的妇女、少数民族和其他弱势群体，制定政策确保他们享有平等机会，很可能会提高经济效率和公平性。然而，在许多国家，父权性别规范作为根深蒂固的守成体系的一部分，限制了妇女的挣钱能力以及跨职业跨代际的社会和经济流动。在经济和社会权利偏向男性的地方，期望快速增长的中等收入国家必须努力为女性提供同等机会。需要出台制度和政策，消除妇女等群体在教育、就业、企业融资、合同签订等方面受到的排斥，并为男性和女性提供托儿服务支持或弹性工作安排等政策。

在教育方面，通过提供奖学金或有条件现金转移来支持女孩延长上学时间的政策，可以改善女性成果。<sup>37</sup>为了提高女生对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的兴趣，辅导和信息干预措施已被证明是极其有效的方法。<sup>38</sup>然而，只有

辅之以其他干预措施解决妇女面临的社会、家庭和后勤制约因素——包括家务和育儿责任，女性教育才最为有效。

### 利用数字技术

数字技术——如互联网、手机、社交媒体和基于网络的信息系统——可以促进社会流动和人才培养。2009年，印度著名科技企业家南丹·尼勒卡尼受命开发了Aadhar（印度数字身份识别系统），为印度积累数字资本（在线活动的数字足迹和数字支付）铺平了道路。数字足迹成为数字资本，个人拥有数字资本并可在申请信贷时选择将其提供给贷方。有关付款、收款、税款和贷款偿还的数字数据都可以用来评估财务信用。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数字资本增加了印度的创业数量和商业收入，对小商贩和经济落后的地区尤为有利。<sup>39</sup>通过提供教学材料，数字技术也为来自弱势背景的学生提供了学习机会。

### 奖励创新者和科学家， 以人才回流抵消人才外流

投资高级技能成本高昂。个人投资这些技能，并期待所积累的才华和掌握的能力能够得到回报。<sup>40</sup>可是，这些回报常常在他国得以实现。

《2023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中等收入国家有10%的高技能人才移居国外，因为西欧和北美对高水平技能的需求更大。<sup>41</sup>为了应对人才外流，报告建议原籍国扩大培训高技能人才的能力，一旦培养出更多人才，即使一些人移民，也更有可能有足够的高技能人才留在国内。

各国采用3i战略时，需要充分利用侨民的知识 and 专长。如果移民与原籍国保持联系，甚至返回，高技能人才的移民就可以成为原籍国的机会。对于乌克兰这样经历了高技能人才大量外流，且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尤其如此。当这些国家对高级技能的需求增加时，侨民就会成为本国孕育创新的重要人才库。

随着移民在国外获得技能，移民可能会带动输出国的人才回流。输出国是经历人才外流还是人才回流，各国情况不尽相同，主要取决于

输出国的移民政策。最有可能接触到现代生产工艺和技术并将宝贵的知识传回原籍国的移民一般都掌握了高级技能，他们迁移到发达经济体，并在那里担任经理人、专业人士、技术人员等主要职位（图O.12）。

建设和扩大优质大学——能够培养顶尖人才、促进创新的大学，需要建立高效的公共研究经费系统，以及畅通的产学联系，以促进知识交流。对中等收入国家而言，最有效的做法是将财政资金集中用于几个战略研究领域，如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卫生健康和能源转型，并根据绩效以竞争方式分配资金。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合作可以成为发展研究基础的一种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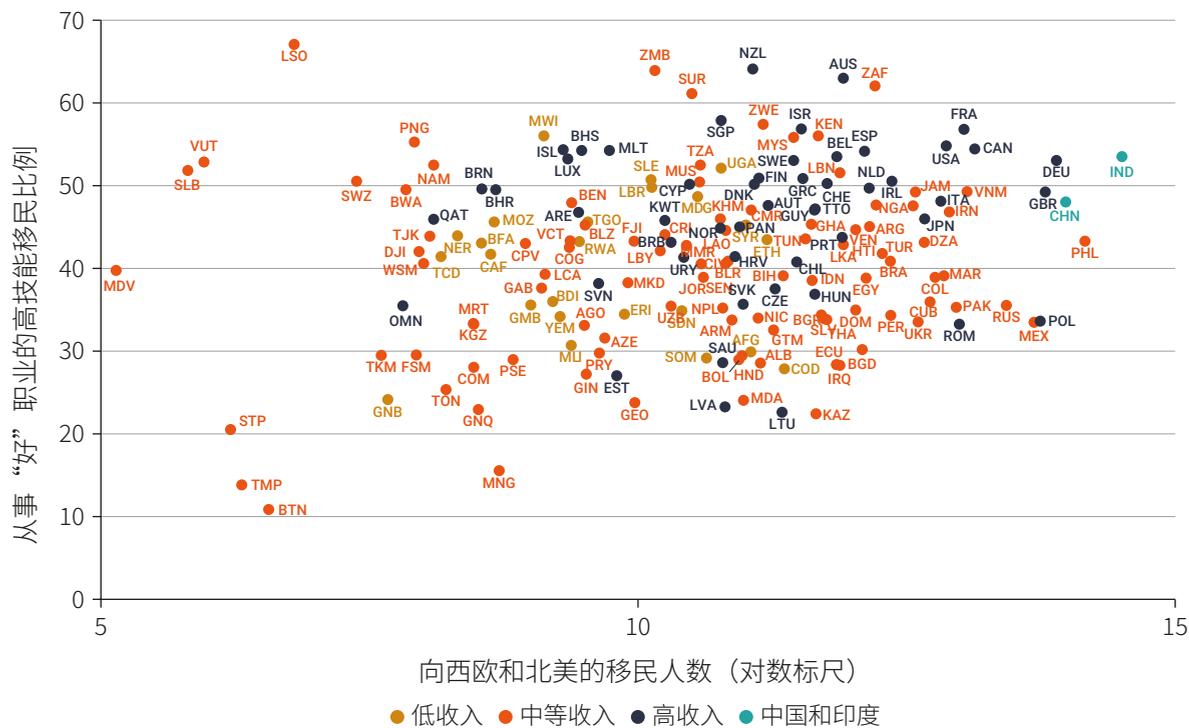
为鼓励大学与产业之间的知识交流，各国可为此类合作提供研发资金。政府还可以为与大学合作的企业提供税收激励。建立知识交流的监管框架很关键，特别是要界定政府对大学利用公共资源生产的知识的产权。产学合作的一个理想成果是由大学教职员、学生和博士后研究员创建企业，私人投资者担任风险投资家。大学还可以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为当地企业提供服务。

### 能源、排放和危机管理

经济体要确保投资、引进、创新三者之间的适当平衡，就必须破坏过时安排——企业、工作、技术、私人合同、政策和公共体制机构。但是在许多国家，经济繁荣时期的破坏力量是薄弱的，而危机往往在削弱守成力量、为创造力量开路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

在能源领域，1980年代的油价冲击提高了化石燃料的相对成本，在加速能效投资和开发清洁能源技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sup>42</sup>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率大幅增长。<sup>43</sup>美国、中国、德国的可再生能源使用量迅速增长，部分原因是政府为应对危机采取了刺激计划。如今，两大危机——气候危机和全球能源危机——共同推动了低碳技术的快速发展

图0.12 拥有大量成功侨民的国家最有可能实现知识转移



来源：《2024年世界发展报告》编写团队。

注：按技能和当前职业分类的移民流动数据来自经合组织DIOC2010-11，涵盖从200个原籍国到34个经合组织目的地国家的移民流动。每个散点代表一个原籍国（或出生国）。对于每个出生国家，x轴表示已完成高等教育并居住在西欧或北美目的国（AUT、BEL、FRA、DEU、NLD、CHE、USA、GBR、IRE、CAN、ESP、ITA、DNK、NOR、SWE；以对数表示）的15岁以上移民人数，Y轴表示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在目的地担任经理人、专业人士或技术人员（“好”职业）的比例。国家缩写参见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网站<https://www.iso.org/obp/ui/#search>。

（低碳技术是指能够抵御气候变化影响的技术或应用）。

### 约束发达经济体，降低全球脱碳成本

随着转向2i战略，中等收入国家将有机会加入低碳产品的全球化供应链，降低全球脱碳成本。然而，其成功将取决于发达经济体能否减少贸易政策中的保护主义。发达经济体的保护主义措施可能成为全球能源转型的最大障碍。

前几波成功实现高收入转型的中等收入国家，受益于全球一体化经济中协调一致的贸易政策。相比之下，今天的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着较为混沌的贸易环境。各国尚未就低碳能源

产品供应链的关键规则达成一致。而“本地制造”补贴可能会大大促进生产迁移——迁移到美国、欧盟以及越来越多的其他经济体，这些经济体都在鼓励“回流本国”和实施当地成分要求。例如，初步建模显示，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将大幅吸引产业从其他主要生产国向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转移。<sup>44</sup>实际上，高收入国家的这些补贴和保护主义措施有可能将中等收入国家排除在低碳价值链之外。

需要明确的是，鉴于全球向低碳能源转型的正外部性以及当今市场失灵的程度，补贴在转型中可以发挥作用。但补贴不应区别对待国内和外国供应商。价值链的每个环节都应当位

于可以以最低成本生产产品的地方，从而避免保护主义报复的风险和逐底竞争（最扭曲、最低效的市场结构）。但是，这种全球性的理性思考很少受到心系国内政治形势的领导人的青睐。他们不太可能实施符合全球一体化经济要求的补贴，因为此类补贴会导致供应链重新配置的收益流向其他国家的企业。

面对这一难题，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应该考虑到，向低碳能源转型具有诸多好处，不仅是通过气候的影响带来的好处，还有通过对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带来的好处。用保护主义措施将中等收入国家排除在全球价值链之外，这些国家的企业和产业就无法获益于边做边学的溢出效应。

为了给中等收入国家留下余地，支持全球的低碳能源转型，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需要更新贸易政策规则，包括限制绿色补贴、出口管制和进口管制，并使用明确的措辞来界定其适当用途。一个办法是用补充条款修改现有协定，就像《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的第20条和第21条被用来规定例外情况一样。此类条款可以直接阐明，如果要实现能源安全的公正转型，所有国家都需要培育国内新兴产业。补贴的使用也应限制在特定情况下，例如需要政府支持来开发和商业化创新型低碳技术。

### 经济增长与排放脱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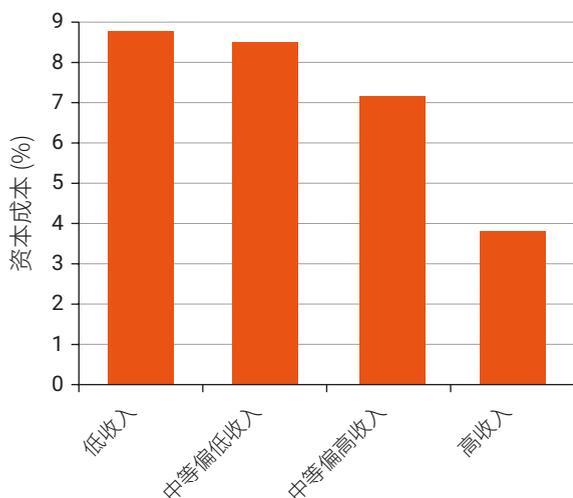
收入的提高增加了能源需求，尽管往往同时也会加深公众对环境的担忧，以及对碳排放导致气候变化的认识。此外，随着中等收入国家转向2i和3i战略来提升经济复杂性，并更广泛地应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其能源需求将大幅上升。事实上，国际能源署（IEA）预测，从2022年到2026年，全球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将增加一倍以上，而人工智能就是其中的重要推手。<sup>45</sup>

中等收入国家需要决定如何最好地降低其经济增长的碳排放——包括能源强度（每美元GDP消耗的能源）和碳强度（每单位能源的碳

排放量）。如今，经济增长产生的排放量超过了通过降低能源强度和碳强度实现的减排量。为了实现经济增长与排放的脱钩，政府需要约束在位者，奖励有益举措，并化解低碳能源投资的风险：

- **约束在位者。**约束在位者的优势对于提高能效和实现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至关重要。市场可竞争性以及为增值企业提供增长机会，可促进节能技术的推广采用。例如在格鲁吉亚，集中度较高的市场能效较低。在阿根廷，技能工人比例较高的企业更有能力采用先进的绿色技术。<sup>46</sup>出口企业的排放强度也往往低于非出口企业。<sup>47</sup>如果在位者受到约束，能源价格上涨有很大潜力促进企业降低能源强度。从长远来看，能源价格的上涨往往会通过效率的提高得到充分补偿。<sup>48</sup>一个主要挑战是能源价格没有充分反映成本——无论是经济成本还是生态成本。据估算，中等收入国家占明确化石燃料补贴的93%。<sup>49</sup>一个有前景的方法是考虑采用总体碳价（TCP）概念，通过直接和间接碳定价工具（包括能源消费税和燃料补贴）来评估价格信号。<sup>50</sup>电力行业，也应该约束在位企业的优势，在这个行业中，在位国企在化石燃料发电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并阻碍新参与者的进入。
- **奖励有益举措。**扩大低碳能源有效供应的最高效方式是恪守**优先交易顺序**：电网运营商向市场售电所遵循的顺序。交易起始点由运行成本最低的发电站提出的最便宜报价确定，由此决定批发市场价格。任何能够以零边际成本（即运营成本微不足道）提供可再生能源的供应商，其电力都应优先用于满足需求。当优先交易顺序按设计运行时，它会沿着供应曲线改变价格，能源经济学称之为“优先交易顺序曲线”。<sup>51</sup>

**图0.13** 中低收入国家可再生能源的资本成本很高



来源：IRENA 2023。  
注：2021年和2022年的数据。

- **化解投资风险。**中等收入国家太阳能光伏、风能等低碳能源的资本成本是高收入国家的两倍，高收入国家的平均资本成本为 3.8%，中等偏高收入国家为 7.2%，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超过 8.5%（图 0.13）。<sup>52</sup>应对技术风险、开发风险和定价风险有助于激励投资者——公用事业、银行或其他机构——投资低碳能源。**化解风险**需要采取全经济的方式。这取决于许可、政策稳定性和社会接受度，以及降低技术、市场和监管风险。<sup>53</sup>化解风险将降低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成本，并减少支持这些项目所需的公共财政资金。

## 未来之路

30年前，小罗伯特·卢卡斯教授说引领韩国取得惊人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仿若创造了“奇迹”。<sup>54</sup>鉴于自韩国还是中等收入经济体以来全球经济的变化，可以公平地得出结论：如果今天的中等收入经济体能够在50年内做到韩国在25年内做到的事情，那将是一个奇迹。即使能复制智利、波兰等其他成功国家的辉煌成就，那也堪称奇迹。而这正是孟加拉国、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摩洛哥、南非、土耳其、越南等国政府希望实现的目标。

为此，这些国家必须更加严谨自律。他们必须准确把握时机，从在发展初期阶段行之有效的更简单的投资导向型增长战略（1i），转变为通过有针对性的政策帮助从国外引进专门技术加快投资（2i），然后再将大量资源用于创新（3i）。换言之，这些国家必须提高资本（包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劳动力和能源的使用效率。

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摒弃长期以来对企业、人才和能源的偏见，必须认识到可靠信息对于塑造和加快结构转型的重要性，而结构转型必须伴随着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持久提高。根据各自国情和所处的发展阶段，各国需要采取循序渐进的、逐步完善的政策组合（表0.3）。低收入国家可以只专注于旨在增加投资的政策，即1i战略。一旦达到中等偏低收入水平，这些国家就需要换挡，将政策组合扩大到2i，即投资+引进。达到中等偏高收入水平后，各国必须再次换挡到“3i”，即投资+引进+创新。中等收入国家需要逐步提高经济自由度，开展更多公开和知情的辩论，以及比以往需要更多的政治勇气来改变根深蒂固的体制和行之已久的安排。

**表 0.3 3i战略：各国在不同发展阶段应采取的行动**

	低收入国家 <i>1i:投资</i>	中等偏低收入国家 <i>2i:投资+引进</i>	中等偏高收入国家 <i>3i:投资+引进+创新</i>
企业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改善投资环境,增加国内外投资。</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通过融入全球竞争市场来约束市场领导者。</li> <li>通过流动要素和产品市场传播全球技术。</li> <li>奖励增值企业,激发企业活力。</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深化资本市场,扩大股权融资。</li> <li>加强反垄断监管和竞争管理机构。</li> <li>保护知识产权。</li> </ul>
人才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投资人力资本,拓宽基础技能,改善学习成果。</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通过为妇女、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提供平等机会来约束精英。</li> <li>改善人才配置,做到人尽其才。</li> <li>建立本地大学与全球一流大学的合作关系。</li> <li>允许受过教育但其技能在国内市场不受重视的劳动者向外移民。</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加强国内产学合作。</li> <li>加强与居住在发达经济体的侨民的联系。</li> <li>提高经济和政治自由度。</li> </ul>
能源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增加投资,以扩大电力获取和电网规模。</li> <li>改革监管框架,吸引私人投资,确保公平竞争。</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通过加强预算约束来严格国企管理。</li> <li>利用国际联盟鼓励发达经济体减少对本土在位企业的保护。</li> <li>支持推行节能措施。</li> <li>在能源价格中体现环境成本,以提高经济效率。</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降低涉及技术、市场和政策的风险,以减少低碳能源的资本成本。</li> <li>增加对超长期投资的多边融资。</li> </ul>

来源：《2024年世界发展报告》编写团队。

## 注释

1. 在本报告中,关于GDP和人均收入的数据均截至2023年7月1日。
2. Gill and Kharas (2007).
3. Kose and Ohnsorge (2024).
4. Melitz and Redding (2021).
5. Soh, Koh, and Aridi (2023).
6. Pinto (2014).
7. Marcel and Vivanco (2021).
8. Lucas (1988); Romer (1990).
9. de Souza (2022).
10. de Souza (2022, 2023).
11. Schumpeter (1942).
12. Vagliasindi (2023).
13. Aghion and Howitt (1992).
14. Hsieh et al. (2019).
15. van der Weide et al. (2021).
16. Gottlieb, Poschke, and Tueting (2024).
17. Akcigit, Grigsby, and Nicholas (2017).
18. Akcigit and Kerr (2018).
19. Cusolito, Garcia-Marin, and Maloney (2023).
20. Bustos (2011).
21. Bloom, Draca, and Van Reenen (2016).
22. Arráiz, Henríquez, and Stucchi (2011).
23. Cirera and Maloney (2017).
24. Eslava and Haltiwanger (2020); Hsieh and Olken (2014).
25. Akcigit, Alp, and Peters (2021).
26. Bertoni, Colombo, and Quas (2023); Kersten et al. (2017).
27. Aivazian and Santor (2008); López and Torres (2020); Tsuruta (2020); Vu and Tran (2021).
28. Bachas, Fattal Jaef, and Jensen (2019).
29. López and Torres (2020).
30. Melitz (2003).
31. Didier and Cusolito (2024).
32. Cheng (2021); Gal et al. (2019).
33. Cunningham, Ederer, and Ma (2021).
34. 社会流动性是指一个国家收入阶梯上的代际上下流动,使子女相对于同代人而言能够脱离其父母所在的位置。
35. Becker et al. (2018).

36. Angrist et al. (2023); World Bank (2018).
37. Chaudhury and Parajuli (2010).
38. Muñoz-Boudet et al. (2021).
39. Dubey and Purnanandam (2023).
40. Akcigit, Baslandze, and Stantcheva (2016).
41. World Bank (2023).
42. Peters et al. (2012).
43. UNEP (2009).
44. Baqae and Farhi (2023).
45. <https://time.com/6987773/ai-data-centers-energy-usage-climate-change/>.
46. Albornoz et al. (2009).
47. Holladay (2016); Richter and Schiersch (2017).
48. Bashmakov (2007); Bashmakov et al. (2023).
49. Black et al. (2023).
50. Agnolucci, Gencer, and Heine (2024). 由于数据限制，TCP中的“能源税”和“能源补贴”基于“净”计算值（作为能源税和能源补贴实际价值的代理变量）。能源税和能源补贴是根据特定年份某个辖区特定部门使用的特定能源载体的零售价格与供应成本之间的“价格差距”来估算的。然后汇总各部门、燃料和国家的净能源税和补贴，得出一个全球值。关于这种方法的更多细节，请参见Agnolucci, Gencer, and Heine (2024)。
51. Acemoglu, Kakhbod, and Ozdaglar (2017).
52. 资本成本的估算基于债务成本和股权成本。债务成本是可再生能源资产的贷款融资成本。股权成本是项目开发商要求的股本回报 (IRENA 2023)。
53. Noothout et al. (2016).
54. Lucas (1988).

## 参考文献

- Acemoglu, Daron, Ali Kakhbod, and Asuman Ozdaglar. 2017. “Competition in Electricity Markets with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Energy Journal* 38 (1): 137–55.
- Aghion, Philippe, and Peter Howitt. 1992. “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 *Econometrica* 60 (2): 323–51.
- Agnolucci, Paolo, Defne Gencer, and Dirk Heine. 2024. “Total Carbon Pricing for Energy Consumption: The Importance of Energy Taxes and Subsidies.” ESMAP Technical Report, Energy Subsidy Reform in Action Series,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Aivazian, Varouj Aram, and Eric Santor. 2008. “Financial Constraints and Investment: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a World Bank Credit Program on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in Sri Lanka.”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41 (2): 475–500.
- Akcigit, Ufuk, Harun Alp, and Michael Peters. 2021. “Lack of Selection and Limits to Delegation: Firm Dynamic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1 (1): 231–75.
- Akcigit, Ufuk, Salomé Baslandze, and Stefanie Stantcheva. 2016. “Tax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Invento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 (10): 2930–81.
- Akcigit, Ufuk, John Grigsby, and Tom Nicholas. 2017. “The Rise of American Ingenuity: Innovation and Inventors of the Golden Age.” NBER Working Paper 23047 (January),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 Akcigit, Ufuk, and William R. Kerr. 2018. “Growth through Heterogeneous Innova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6 (4): 1374–443.
- Albornoz, Facundo, Matthew A. Cole, Robert J. R. Elliott, and Marco G. Ercolani. 2009. “In Search of Environmental Spillovers.” *World Economy* 32 (1): 136–63.
- Angrist, Noam, Elisabetta Aurino, Harry A. Patrinos, George Psacharopoulos, Emiliana Vegas, Ralph Nordjo, and Brad Wong. 2023. “Improving Learning in Low- and Lower-Middle-Income Countries.” *Journal of Benefit-Cost Analysis* 14 (S1): 55–80.
- Arráiz, Irani, Francisca Henríquez, and Rodolfo Stucchi. 2011. “Impact of the Chilean Supplier Development Program on the Performance of SMEs and Their Large Firm Customers.” OVE Working Paper OVE/WP–04/11 (May), Office of Evaluation and Oversight,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Washington, DC.
- Bachas, Pierre, Roberto N. Fattal Jaef, and Anders Jensen. 2019. “Size-Dependent Tax Enforcement and Compliance: Global Evidence and Aggregate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40 (September): 203–22.
- Bahar, Dany, Sebastian Bustos, and Muhammed A. Yildirim. 2024. “Stages of Diversification Revisited.” Background paper prepared for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24*,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Baqae, David Rezza, and Emmanuel Farhi. 2023. “Networks, Barriers, and Trade.” NBER Working Paper 26108 rev. (February),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 Bashmakov, Igor. 2007. “Three Laws of Energy Transitions.” *Energy Policy* 35 (7): 3583–94.
- Bashmakov, Igor, Michael Grubb, Paul Drummond, Robert Lowe, Anna Myshak, and Ben Hinder. 2023. “‘Minus 1’ and Energy Costs Constants: Empirical Evidence, Theory,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SSRN Preprint (March 30),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 Rochester, NY.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4401851](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4401851).
- Becker, Gary Stanley, Scott Duke Kominers, Kevin M. Murphy, and Jörg L. Spenkuch. 2018. “A Theory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6 (S1): S7–S25.
- Bertoni, Fabio, Massimo G. Colombo, and Anita Quas. 2023.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Loan Guarantees on SME Performance.”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80 (June): 102408.

- Black, Simon, Antung A. Liu, Ian W. H. Parry, and Nate Vernon. 2023. "IMF Fossil Fuel Subsidies Data: 2023 Update." IMF Working Paper WP/23/169 (Augus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Bloom, Nicholas, Mirko Draca, and John Van Reenen. 2016. "Trade Induced Technical Change? The Impact of Chinese Imports on Innovation, IT and Productivit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3 (January): 87–117.
- Bustos, Paula. 2011. "Trade Liberalization, Exports, and Technology Upgrading: Evidence on the Impact of MERCOSUR on Argentinian Firm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 (1): 304–40.
- Chaudhury, Nazmul, and Dilip Parajuli. 2010.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 and Female Schooling: The Impact of the Female School Stipend Programme on Public School Enrolments in Punjab, Pakistan." *Applied Economics* 42 (28): 3565–83.
- Cheng, Thomas K. 2021. *The Patent-Competition Interfa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epeliev, Maksym, and Erwin Corong. 2022. "Revisiting the Environmental Bias of Trade Policies Based on an Environmentally Extended GTAP MRIO Data Ba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virtual 25th Annual Conference, Global Economic Analysis, Center for Global Trade Analysi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Purdue University, West Lafayette, IN, June 8–10, 2022. [https://www.gtap.agecon.purdue.edu/resources/res\\_display.asp?RecordID=6548](https://www.gtap.agecon.purdue.edu/resources/res_display.asp?RecordID=6548).
- Choi, Jaedo, and Younghun Shim. 2024. "From Adoption to Innovation: State-Dependent Technology Poli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TEG Working Paper WP091 (March),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London.
- Cirera, Xavier, and William F. Maloney. 2017. *The Innovation Paradox: Developing-Country Capabilities and the Unrealized Promise of Technological Catch-Up*.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Cunningham, Colleen, Florian Ederer, and Song Ma. 2021. "Killer Acquisi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9 (3): 649–702.
- Cusolito, Ana Paula, Alvaro Garcia-Marin, and William F. Maloney. 2023. "Proximity to the Frontier, Markups, and the Response of Innovation to Foreign Competition: Evidence from Matched Production-Innovation Surveys in Chil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Insights* 5 (1): 35–54.
- de Souza, Gustavo. 2022. "The Labor Market Consequences of Appropriate Technology." Working Paper WP 2022-53 (September 6),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hicago, Chicago.
- de Souza, Gustavo. 2023. "R&D Subsidy and Import Substitution: Growing in the Shadow of Protection." Working Paper WP 2023-37 rev. (October 5),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hicago, Chicago.
- Didier, Tatiana, and Beulah Chelva. 2023. "Private Equity Markets in EMDEs."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Didier, Tatiana, and Ana Paula Cusolito. 2024. *Unleashing Productivity through Firm Financing*.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Dubey, Tamanna Singh, and Amiyatosh Purnanandam. 2023. "Can Cashless Payments Spur Economic Growth?" Presentation at 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s Summer Institute 2023, "Macro, Money, and Financial Frictions." Cambridge, MA, July 12–13, 2023.
- Energy Institute. 2023.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23." June, Energy Institute, London.
- Eslava, Marcela, and John C. Haltiwanger. 2020. "The Life-Cycle Growth of Plants: The Role of Productivity, Demand and Wedges." NBER Working Paper 27184 (May),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 Gal, Peter, Giuseppe Nicoletti, Theodore Renault, Stéphane Sorbe, and Christina Timilioti. 2019. "Digitalisation and Productivity: In Search of the Holy Grail; Firm-Level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EU Countries." 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 1533 (February 6),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aris.
- Gill, Indermit Singh, and Homi Kharas. 2007. *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 With Deepak Bhattasali, Milan Brahmabhatt, Gaurav Datt, Mona Haddad, Edward Mountfield, Radu Tatucu, and Ekaterina Vostroknutov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Gottlieb, Charles, Markus Poschke, and Michael Tueting. 2024. "Skill Supply, Firm Siz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ackground paper prepared for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24*,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Holladay, J. Scott. 2016. "Exporters and the Environment."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49 (1): 147–72.
- Hopenhayn, Hugo A. 1992. "Entry, Exit, and Firm Dynamics in Long-Run Equilibrium." *Econometrica* 60 (5): 1127–50.
- Hsieh, Chang-Tai, Erik Hurst, Charles I. Jones, and Peter J. Klenow. 2019. "The Allocation of Talent and U.S. Economic Growth." *Econometrica* 87 (5): 1439–74.
- Hsieh, Chang-Tai, and Peter J. Klenow. 2014. "The Life Cycle of Plants in India and Mexico."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 (3): 1035–84.
- Hsieh, Chang-Tai, and Benjamin A. Olken. 2014. "The Missing 'Missing Middl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8 (3): 89–108.
- IEA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23. *World Energy Outlook 2023*. Paris: IEA.
- IRENA (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2023. "The Cost of Financing for Renewable Power." IRENA, Abu Dhabi, United Arab Emirates.
- Jones, Charles I. 2016. "The Facts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Handbook of Macroeconomics*, vol. 2A, edited by John B. Taylor and Harald Uhlig, 3–69. Amsterdam: Elsevier.
- Kersten, Renate, Job Harms, Kellie Liket, and Karen Maas. 2017. "Small Firms, Large Impact?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SME Finance Literature." *World Development* 97 (September): 330–48.
- Kose, M. Ayhan, and Franziska Ohnsorge, eds. 2024. *Falling Long-Term Growth Prospects: Trends, Expectations, and Policie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López, José Joaquín, and Jesica Torres. 2020. "Size-Dependent Policies, Talent Misallocation, and the Return to Skill."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38 (October): 59–93.
- Lucas, Robert B., Jr. 1988.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 (1): 3–42.
- Marcel, Mario, and Diego Vivanco. 2021. "Measuring Small and Medium-Size Enterprises' Contribution to Trade in Value Added: The Case of Chile 2013–2016." Working Paper of the Central Bank of Chile 914 (April), Central Bank of Chile, Santiago.
- Melitz, Marc J. 2003.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Econometrica* 71 (6): 1695–725.
- Melitz, Marc J., and Stephen J. Redding. 2021. "Trade and Innov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28945 (Jun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 Muñoz-Boudet, Ana María, Lourdes Rodríguez-Chamussy, Cristina Chiarella, and Isil Oral Savonitto. 2021. "Women and STEM i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Report AUS0002179,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Noothout, Paul, David de Jager, Lucie Tesnière, Sascha van Rooijen, Nikolaos Karypidis, Robert Brückmann, Filip Jirouš, et al. 2016. *The Impact of Risks in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s and the Role of Smart Policies: Final Report*. Karlsruhe, Germany: Fraunhofer Institute for Systems and Innovation Research.
- Peters, Glen P., Gregg Marland, Corinne Le Quéré, Thomas Boden, Josep G. Canadell, and Michael R. Raupach. 2012. "Rapid Growth in CO<sub>2</sub> Emissions after the 2008–2009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Nature Climate Change* 2: 2–4.
- Pinto, Brian. 2014. "Why Poland Beat the Odds." Chapter 4 in *How Does My Country Grow? Economic Advice through Story-Telling*, 55–7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ichter, Philipp M., and Alexander Schiersch. 2017. "CO<sub>2</sub> Emission Intensity and Exporting: Evidence from Firm-Level Data."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98 (September): 373–91.
- Romer, Paul Michael. 1990.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 (5, Part 2): S71–S102.
- Schumpeter, Joseph Alois. 1942.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 Serajuddin, Umar, and Nada Hamadeh. 2020. "New World Bank Country Classifications by Income Level: 2020–2021." *Data Blog* (blog), July 1, 2020. <https://blogs.worldbank.org/opendata/new-world-bank-country-classifications-income-level-2020-2021>.
- Soh, Hoon Sahib, Youngsun Koh, and Anwar Aridi, eds. 2023. *Innovative Korea: Leveraging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Tsuruta, Daisuke. 2020. "SME Policies as a Barrier to Growth of SMEs."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54 (4): 1067–106.
- UNEP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2009.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Its Impact on Renewable Energy Finance." Division of Technology, Industry, and Economics, UNEP, Nairobi, Kenya.
- Vagliasindi, Maria. 2023. "The Role of SOEs in Climate Change." Background paper prepared for *The Business of the Stat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van der Weide, Roy, Christoph Lakner, Daniel Gerszon Mahler, Ambar Narayan, and Rakesh Ramasubbaiah. 2021.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round the World."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9707,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Vu, Quang, and Tuyen Quang Tran. 2021. "Government Financial Support and Firm Productivity in Vietnam."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40 (May): 101667.
- World Bank. 1978.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78*.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World Bank. 2015. *Peru: Building on Success: Boosting Productivity for Faster Growth*.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World Bank. 2018.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8: Learning to Realize Education's Promis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World Bank. 2023.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23: Migrants, Refugees, and Societie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24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等收入陷阱》

## 目录

xv	前言
xvii	致谢
xxi	摘要
xxv	术语表
xxix	缩略语
<b>1</b>	<b>概述：创造奇迹</b>
<b>31</b>	<b>第1部分：中等收入国家转型</b>
<b>33</b>	<b>第1章：增长放缓</b>
<b>47</b>	<b>焦点</b>
<b>53</b>	<b>第2章：结构性停滞</b>
<b>69</b>	<b>第3章：缩小的空间</b>
<b>81</b>	<b>第2部分：创造性破坏</b>
<b>85</b>	<b>第4章：创造</b>
<b>109</b>	<b>第5章：守成</b>
<b>135</b>	<b>第6章：破坏</b>
<b>159</b>	<b>第3部分：创造奇迹</b>
<b>161</b>	<b>第7章：约束在位者</b>
<b>189</b>	<b>第8章：奖励有益举措</b>
<b>221</b>	<b>第9章：善用危机</b>









# 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国家正在与时间赛跑。从1990年代到现在，很多国家在跨越低收入水平和消除极端贫困方面做得足够出色，使得大家认为过去三十年是发展事业的伟大年代。但是，人均收入在1100美元到14000美元之间的100多个经济体的雄心是在下一代的时间达到高收入水平。按照这一目标来衡量，过去的记录令人气馁。自1970年代以来，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中位数停滞在低于美国的十分之一的水平。随着人口老龄化、保护主义加剧以及加快能源转型的压力不断增加，今天的中等收入经济体面临着越来越艰巨的挑战。要想在逆风愈加强劲的情况下成为发达经济体，中等收入国家必须创造奇迹。

《2024年世界发展报告》汲取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发展经验，并结合了经济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为发展中经济体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指明了路径。报告指出，中等收入国家需要的不是一次而是两次转型：第一次从投资到引进，第二次从引进到创新。中等偏低收入国家的政府必须摒弃重复同样的投资驱动型发展战略的习惯做法，而应致力于在经济中引进世界各地的现代技术和成功商业流程。大部分经济体都需要重塑为有全球竞争力的商品和服务供应商。引进成功的中等偏高收入国家就可加快向创新的转型——不再只是借鉴全球技术前沿的思想理念，而是开始推动前沿技术的发展。这一阶段需要再次调整企业、工作和能源使用，并更加重视经济自由、社会流动和政治竞争。

两次转型都不会自动发生。从中等收入迅速转型到高收入的为数不多的经济体，通过约束强大的在位者来鼓励企业发展，通过奖励有益举措来培养人才，并通过善加利用危机改变了不再符合初衷的政策和体制。今天的中等收入国家也必须这样做。